



作者

理查德·杰克逊

尼尔·豪

托比亚斯·彼特

翻译

周健工

平衡传统与现代：
东亚地区
退休养老前景

关于本报告

《平衡传统与现代：东亚地区退休养老前景》由英国保诚集团资助，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全球老龄化项目组撰写。本报告是历时数年的“未雨绸缪：全球老龄化研究项目”的一部分，CSIS与英国保诚集团在2010年发起该项目，并出版了《全球老龄化绸缪指数报告》——一个评估世界各国退休制度财政可持续性 & 收入充足性的独特新工具。《平衡传统与现代：东亚地区退休养老前景》报告的补充材料包括数据、分析和媒体报道。上述材料可通过访问该项目网站gapindex.csis.org/asia获取。

Copyright © 2012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ll rights reserved.

目录

项目执行概况	i
致谢	v
引言	
CSIS东亚退休状况调查	1
第一章	
位于十字路口的东亚地区	3
第二章	
调查结果： 退休观念的变革	9
家庭赡养力度下降	9
个人责任增强	13
第三章	
调查结果： 当前退休的现状	21
第四章	
调查结果： 未来	27
第五章	
对于政府及企业的战略意义	39
对政府政策制定者的意义	39
对于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意义	41
技术说明	43

作者

理查德·杰克逊

尼尔·豪

托比亚斯·彼特

翻译

周健工

平衡传统与现代：

东亚地区 退休养老前景

项目执行概况

随着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政府与企业都在试图以超前的眼光，预测未来规模越来越大的老年人的需求。而在东亚的新兴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尤为困难。

东亚地区处于巨变之中，该地区的经济体正以惊人的速度实现现代化，生活水准快速提高，生育率大幅下降，导致家庭规模缩小，人口开始急剧老龄化。东亚地区现代化的高速发展，也使得年轻人和老年人在许多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生活相对充裕，受过良好的教育，更加熟悉市场运作，在这些方面所达到的程度要高得多。东亚地区尽管经济发展迅猛，但其现代特性与传统特性仍相互交织，日新月异的高科技产业与大量的非正规经济以及不完善的国家福利体系并存。

东亚地区的退休制度更是尚未成型。尽管正规的退休体系正在走向成熟，但覆盖范围和慷慨程度仍然极其有限。许多国家的政府依赖由家庭赡养长辈的“儒家伦理”，从而缩减国家的养老职能。不过，家庭目前正在承受来自现代化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汹涌的老龄化浪潮势将吞没整个东亚地区，拉低经济增速，推高老龄抚养费用，将重担压在政府和家庭的肩头。

东亚地区的退休者如何应对这些变化的？上班族如何规划将来的退休？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从青年到暮年，公民更青睐哪种退休制度？

为了从上班族和退休者的角度更好地理解东亚新兴国家未来的退休图景，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在中国、中国香港特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进行了调查。我们还在英国进行了同样的调查，以提供与一个典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对比案例。

调查结果

家庭赡养力度下降

调查证实，大家庭（extended family）在东亚国家退休保障中扮演的角色，仍然远远比在西方更为重要。在我们调查的六个国家和地区中，35%到65%的老人与自己一个或者更多成年儿女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大家庭中，收入从年轻人向老年人发生转移流动。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家庭的作用也已经开始减弱。调查结果还显示了进一步削弱家庭作用的普遍愿望。当被问道“最好由谁来为退休者的收入保障承担最大的责任”时，在所有国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

受访者回答说“退休者的成年儿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在展望自己的退休图景时，在职者并不期望能从大家庭获得像当前退休者所得到的收入资助。家庭规模缩小或许是推动这一转变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发展的高速度，以及更注重个人主义的“西方价值观”的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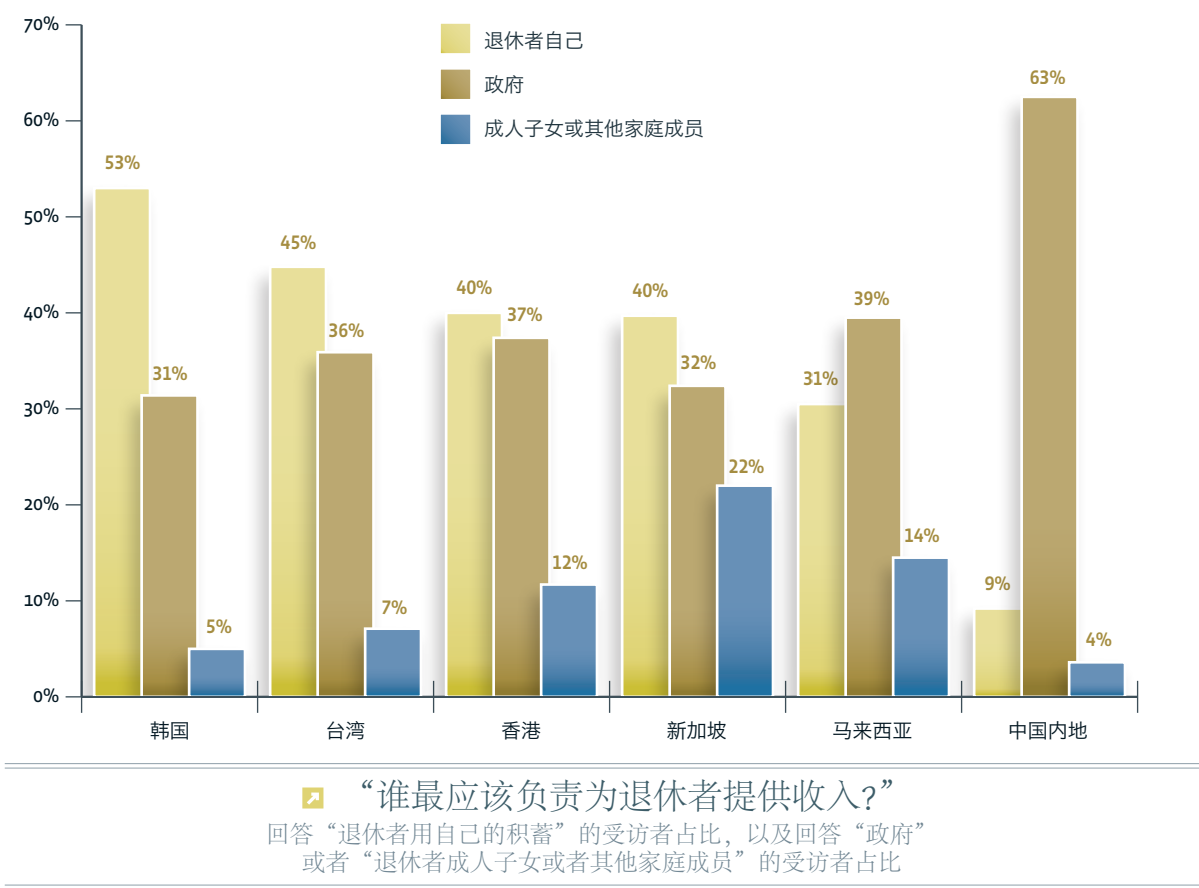
个人责任增强

如果家庭的作用弱化了，那么由谁来主要负责为退休者提供收入呢？除了中国和马来西亚，其他四个被调查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选择了由个人通过储蓄来承担提供退休收入的责任，而非由政府或者雇主承担。坚决支持这一观点的国家和地区，都具备成熟的资本市场和产权制度界定分明

的传统。最赞成这一观点的人群包括高收入者和自雇群体。假定政府和雇主不能提供任何支持，要他们在家庭和个人的责任承担之间做出选择，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都有选择个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受访者中，做出这样选择的占压倒多数：台湾72%，韩国78%。唯有在中国和新加坡，认为家庭应承担主要责任的比例接近认为个人应承担主要责任的比例。

当前退休的现状

在过去十几年里退休的人们，退休时，国家发展正处于艰难的十字路口。传统的家庭赡养体系已然削弱，政府和市场的替代力量却尚未完善。在不同国家和地区，15%到35%已退休者反映，



他们未获得任何形式的退休福利（包括基于资产审查的贫困资助）。现已退休的人们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往往难以积累个人储蓄，很多人又被迫提前退休，积蓄愈加不敷使用。13%（中国）到75%（韩国）的退休者反映，退休后的收入比退休前少很多。很多受访者还担心成为“子女的负担”，担心“生活贫困，缺钱”，或者“身体糟糕，没人照顾”。在成熟和普惠的退休体系缺位的情况下，经济的急速增长导致退休的年长者与富有的年轻一代的生活水准差距明显拉大。

未来

鉴于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巨大差异，随着年轻一代走向退休年龄，东亚地区的退休制度在未来的几十年将彻底转型。调查报告发现的若干关键趋势，将塑造未来退休者的期望和行为：

▣ **富裕程度上升。**明天的退休者将越来越富有。随着东亚各国人口的老齡化，经济增长放缓，个人储蓄的回报率可能比年轻一代工资的增长率更高，导致其收入和财富呈现更接近西方国家的年龄分布，进一步削弱依赖大家庭资助的需求。

▣ **受教育程度上升。**明天的退休者获得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学位的可能性更大。更多的退休者具备理财知识，能积极地参与退休规划。许多到退休年龄的人具备继续工作的意愿和技能。

▣ **个体主动性增强。**明天的退休者期望对自己的退休储蓄有控制权。希望成为企业家或计划创业的人数也将大幅增加。

▣ **市场导向性增强。**明天的退休者将成为精明的投资者，要求得到高质量的金融咨询服务和产

品。从金融资产获得收入的退休者的比例会高达75%到90%，高于英国。

▣ **对工作和退休的态度更灵活。**明天的退休者可以选择晚退休，也可以选择从第一职业生涯中早“退休”，然后转入第二职业生涯，或者开始自己创业。

▣ **国家养老金体系走向成熟。**即使国家退休制度变得更加完善，明天的退休者仍然无法从中获得满意的服务。对大多数人来说，养老福利替代率相对于西方国家水平来说很低；对一定数额的少数人来说，根本得不到任何养老福利。

▣ **储蓄缺口挥之不去。**明天的退休者要享有充裕的生活水准，不仅要多储蓄，还需要储蓄有高回报。在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年人的金融资产／收入比在1:1到2:1之间，远远低于弥补养老金福利和退休收入需求之间的差距所需要的数额。

战略意义

对政府政策制定者的意义

▣ **要求在职者为退休储蓄更多。**这一策略不仅与本调查反映的文化倾向完全吻合，在经济上也非常明智。随着东亚劳动力队伍增长放慢，甚至规模缩小，生产率增长与发达国家的增速趋于一致，基金制养老体系相对于现收现付制的优势将毋庸置疑。

▣ **促进金融市场自由化，保护财产权，加强法治。**在退休保障基于储蓄的情况下，人们对储蓄的完整所有权必须得到确保。这就要求对妨碍储蓄者获得全球水平的资本回报率的政府政策加以变革。

▣ **提高正式退休年龄。**大多数被调查国家和地区的正式部门实行强制性提前退休，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代价高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也许需要让技能差的老员工退休，为技能熟练的年轻员工腾出位置。但是，随着受教育程度和预期寿命的增加，让年长员工离职不仅毫无必要，效果还会适得其反。

▣ **设立慷慨的老龄贫困保障底线。**设立老龄贫困保障底线的意义不仅在于确保社会的基本保障，在快速老龄化、养老缺口无法消除的社会中，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危机。

对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意义

▣ **为自己希望承担退休负责的在职者设计、营销金融产品和服务。**今天的在职者更重视个体责任，也了解金融市场，这意味着对复杂金融产品的需求将快速增加。但是，金融服务提供商也应该看到：年轻的一代受教育程度高，市场导向性强，在投资选择上要求更多的自主权，更加关注自己的储蓄是否获得了市场水平的回报率。

▣ **满足公众需要，将家庭储蓄和雇主一次性退休支付转换为年金。**本调查显示，对将退休收入年金化的支持比例非常高。人们懂得，一次性支付的方法过于原始，是家长式雇佣制度的遗留物，在人们可以提前退休、人的寿命延长的社会中显得不合时宜。

▣ **为更灵活的工作和退休模式设计产品。**随着开始摒弃终生受雇一家企业的传统模式，在职者希望有可能动用退休储蓄和保险产品，为过渡到第二职业筹措资金。

▣ **在设计和营销金融产品时，不忽略孝道观念。**调查报告引申的涵义既意义重大，也很周全。财务独立和尽孝道相互并不排斥。许多受访者表示，希望退休后既能财务独立，又能和儿孙生活在一起。年轻一代也并不抵制孝道伦理。本调查收集的证据显示，儒道复兴在一些国家已初现端倪。

致谢

在埋首编撰《平衡传统与现代：东亚地区退休养老前景》时，作者们获他人援手不计其数，故欣然在此向几位最重要者致谢。

首先，必须要感谢 **Warren Wright** (**Warren Wright** 咨询公司总裁)，他全程管理了本项目的调查阶段。如果没有其在调查中体现的卓越的专业知识与专注精神，这一报告可能根本无法动笔。作者们还要感谢 **CSIS** 全球老龄化项目的研究顾问 **Serena Yi-Ying Lin**，她纠正了调查问卷中的中文翻译错误，帮助解决了棘手的方法论问题，并且对东亚文化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作者们还要对 **Keisuke Nakashima** (日本神户大学讲师及 **CSIS** 兼职研究员) 表示感谢，他在关键阶段提供了专业协助；同时还要向 **Autumn Szelig** 表示感谢，他在 **CSIS** 全球老龄化项目实习时展示出其才干，帮助对数据进行制表及清理。

作者们还要感谢英国保诚集团对本项目的资助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协助。作者们尤其希望感谢 **John Murray** (保诚集团传讯总监) 及 **Donald P. Kanak** (保诚集团亚洲公司董事长) 对本

项目的信心；**Miles Celic** (保诚集团公共事务及政策总监) 不懈的支持及深思熟虑的反馈；还有 **Paul Hancock** (机构销售及养老和基金区域主管) 的诸多颇有见地的建议。作者们还要感谢 **Namali MacKay** (国际关系主管)、**Henry Barstow** (国际公共事务经理) 以及 **Philippa Dale-Thomas** (项目协调人) 帮助监督本报告的制作过程，并感谢 **Marc-Xavier Fancy** (保诚集团亚洲政府关系主管) 组织了报告在亚洲的首发。

James H. Graham II (**Spark** 传媒集团创意总监) 负责设计本报告及项目网站。作者们不仅感谢他精准的设计感，也感谢他愿意在紧张的时限下工作。周健工与江舒桦的翻译娴熟地表达了英文的原意，值得嘉许。作者们还要对 **CSIS** 对外关系及 IT 部门的同事们的帮助致以谢意。作者们要特别提及 **Andrew Schwartz** (对外事务副总裁)、**Ryan Sickles** (对外事务项目协调人) 以及 **Ian Gottesman** (首席信息官)。

作者们衷心感谢在撰写报告过程中所获得的帮助。本报告作者对报告内容负全责。

CSIS东亚 退休状况调查

随

随着世界各国人口老龄化，政府与企业都在试图以超前的眼光，预测未来规模越来越大的老年人的需求。而在东亚的新兴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尤为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该地区的人口将迅速老龄化，而且还在于高速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对退休持有的态度和相应行为。过去几十年里，各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引入注目。在整个东亚地区，几代人之间的教育水平、就业模式以及收入和财富水平，经历了惊人的转变。在大多数国家，大家庭——自古以来的主要退休保障方式——正承受着现代化力量日益猛烈的冲击。然而，大部分国家尚未发展适当的政府和市场替代保障方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东亚新兴国家未来的退休图景，CSIS 在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特区、马来西

亚、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地区¹进行了调查。我们还在英国进行了同样的调查，以提供与一个典型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对比视角。针对新兴市场退休相关问题的大多数调查，都仅仅关注经济体中正规经济领域的中等收入和上等收入家庭；我们的调查覆盖了更广泛的人群，包括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和收入较低者，从而提供一个关于退休经历和期望的更完整图景。中国有一些例外：尽管我们在中国的调查范围也非常广泛，但却仅限于城镇居民，没有纳入发展程度落后的乡村。在所有国家中，受访者均包括目前的和已退休的家庭收入的主要创造者，他们是家庭成员中最可能负责退休规划的人，并对家庭财务情况有周详的了解。²

¹ 为行文方便，本报告中使用的“国家”一词指开展调查的所有6个独特地理和经济实体，包括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国家”一词的使用并无蕴含对这6个实体在国际法或实例中的主权或地位做出任何的判断。

² 本报告末尾的“技术说明”提供了调查方法的更多细节信息。补充调查数据可通过访问全球老龄化捆绑指数（GAP Index）网站 csis.gapindex.org/asia 获取。

本调查共包括三个模块。第一模块提供了人生态度或规范问题，旨在确定可能影响退休行为和政策未来走向的关键社会和文化假设。这些问题涵盖了受访者对各类问题的看法，从孝道、长期储蓄到政府、个人和家庭在提供退休收入或照顾病患老人方面的理想角色，均包括在内。第二个模块则关注受访者自身的个人退休经历和期望。模块中的相关问题询问了已退休受访者的目前状况，以及尚未退休的受访者所期望的退休待遇。此外，还涉及到以下事宜，例如，受访者的退休年龄或期望退休年龄；他们的实际退休收入来源，或期望的退休收入来源；在大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包括目前和期望的生活安排、财务资助以及非正式护理。第三个模块通过受访者，收集了基本的人口数据和经济数据，包括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组成情况；就业经历和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收入和资产。

本调查呈现的画面反映了处于惊人巨变之中的社会和退休体制。家庭在退休保障中的主导作用正逐渐减弱。在除中国外的所有调查国家和地区，得出的数据极力证明了这一点，有些甚至明确倾向于将养老责任从家庭转移到个人，而不是转移给政府。对于今天的老年人来说，旧秩序已然式微，新秩序尚未成型，但他们业已老去，退休往往让他们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边缘地带。对于

今天的在职者来说，他们的富裕程度、受教育水平和市场导向性，都远远超过上一代人，退休前景整体而言也光明得多。不过，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同样担忧暮年时的保障，这并非杞人忧天。尽管对个人承担养老责任的支持率很高，但大多数人尚未为保持退休的生活水准储备足够的资产。很多人对退休生活怀有很高的期望，但假如个人行为 and 公共政策不做出根本改变，他们必将失望不已。

本报告所依据的调查，对东亚即将开展的退休变革提出了极具说服力的新见解。在第一章，我们通过审视正在重新塑造东亚新兴国家的经济、社会大趋势，为讨论设置了大背景，随后开始研究调查结果本身。在第二章，我们探究调查反映出的退休观念的变革，尤其是家庭、个人和政府 在退休保障方面的作用。在第三章，我们分析了现今退休一代的退休经历，这一代曾经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进退维谷。在第四章，我们通过研究一系列代际转变，描述未来退休人士的退休行为和期望的可能趋势，包括更高的富裕程度和受教育水平，更强的个体主动性和市场导向性，这些令他们的生活经历与今天的退休者大相径庭。在第五章，我们简要讨论了调查结果对于政府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战略意义。

位于十字路口的东亚地区

正

如大部分制度，退休也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在开始分析调查结果之前，先考虑一下影响东亚新兴市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大趋势，似乎不无裨益。在本章中，我们将简要探讨我们认为在决定退休行为和期望演化中，将起到最重要作用的因素。在这一探讨过程中，我们将指出东亚与西方环境的关键差异。

▣ **东亚新兴市场的生活水准经历了长期的超高速增长。**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在20世纪60年代率先开始了经济腾飞。随后，马来西亚（常被称为“伊斯兰虎”）的经济增长开始加速，但速度相对缓慢。而在中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经济才快速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中

期以来，“亚洲四小龙”的人均实际生活水准增长了4到6倍，中国则增长了15倍多，因为中国的起点要低得多。（见图1.）在同一历史时期，西方主要经济体生活水准的增幅都没有超过两倍。随着生活水准向发达国家靠拢（马来西亚除外），如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速已有所放缓。而在中国，生活水准每七八年依然会翻一番。东亚地区史无前例的经济崛起，不仅大幅改善了物质条件，还帮助培养了对未来的乐观情绪。

▣ **虽然东亚地区的生活水准普遍迅速增长，但该地区的新兴市场所处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极其不一致。**在香港和韩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正逐渐接近G-7国家的平均数；台湾和新加坡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则已超过G-7国家的平均数。另一方面，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家庭收入中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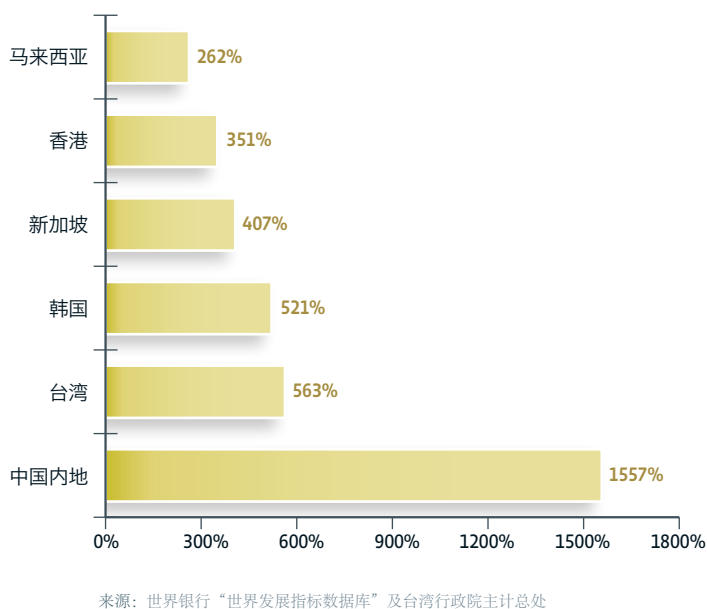


图1. 从1975年到2010年，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人均GDP累积变化

数，分别只是G-7国家平均数的 $\frac{1}{5}$ 和 $\frac{1}{3}$ ，生活水准仍然远远落后于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见图2.）此外，中国的收入中位数据来自城镇家庭。如果将面积辽阔、发展落后的乡村地区纳入平均数的计算当中，那么中国与G-7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与收入差异相对应的，是市场发展和制度能力上的差异，收入越高的国家，往往市场发展越好，制度能力越强。

东亚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同样快速的人口变化。整个东亚地区正经历所谓的人口转型——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转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这是经济发展与现代化发展的必要产物。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所有东亚国家都有高生育率、大家庭规模以及快速增长的人口。当时，老年人（在本报告中，将6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定义为老年人）仅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

各国的老年人比例不超过10%。但之后在除马来西亚以外的所有国家，生育率骤降到了2.1的更替水平之下，“亚洲四小龙”的生育率更降至世界最低水平。与此同时，预期寿命大幅延长，导致年龄结构无可避免地向上倾斜。除马来西亚外，年龄中位数从1975年的18到22增至35到42。马来西亚的生育率较高，目前其年龄中位数只有26，比其他被调查国家要年轻得多。尽管东亚国家的老年人人口比例相对依然较小，但这一数字也已开始快速增长。西方国家经历过同样的人口转型，只是转型过程的开始要早得多，而老龄化速度则慢得多。东亚正以惊人的速度，历经从年

轻、不断成长到衰老及不断下滑的整个人口历程——速度不仅快于西方在过去几十年的速度，也快于今天其他任何新兴地区的速度。

到目前为止，东亚的人口变化趋势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生育率刚刚开始下降，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启了一扇名为“人口红利”的机会之窗。随着儿童数量的下滑，工作年龄的成人相对于受抚养儿童和老人的比率快速上扬，推高了人均收入。1975年，工作年龄人口比例在被调查国家中为41%到48%不等。如今，除了马来西亚，各国的这一数字至少达到了60%。抛开这个简单的算术不谈，人口扶养负担日益下降，还可以增强经济发展能力。随着女性更多地投身到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参与率进一步升高。随着更多的人进入高储蓄率的中年阶段，储蓄率不断上升。家庭（及政府）发现，他们

有能力投入更多的资源，提高越来越珍贵的儿童群体的“素质”，因此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增加了。根据某些评估数据，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生活水准增幅的 $\frac{1}{3}$ 到 $\frac{2}{3}$ ，源自其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变迁。³

东亚各国社会有不同寻常的高

储蓄率。

在东亚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储蓄率和家庭储蓄率均高于大部分西方国家。对于东亚的节俭特性，存在几种解释。根据众所周知的杜森贝里相对收入假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家庭储蓄率往往很高，因为人们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消费愿望追赶的速度。同时，欠完善的消费者信贷、抵押市场和社会安全网，也进一步促使人们增加储蓄，未雨绸缪。然而，最有力的解释或许是储蓄的生命周期动机，即为了退休而储蓄。这一动机在东亚产生的效应比在西方更强，其中一部分是因为正式退休体系的覆盖面依然有限，另一部分是因为儿女奉养年迈父母的传统“儒家伦理”期望正在减弱。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调查中，基于储蓄的退休保障得到了极高的支持率。

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是，东亚的年轻人通常比老年人更富有。当社会经历极快的发展时，老年

³ 例如可参见David E. Bloom and Jeffrey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世界银行经济评论》2012年第3期(1998年9月); 及David E. Bloom, David Canning和Pia N. Malaney, “Demographic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CID工作论文第015期(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 1999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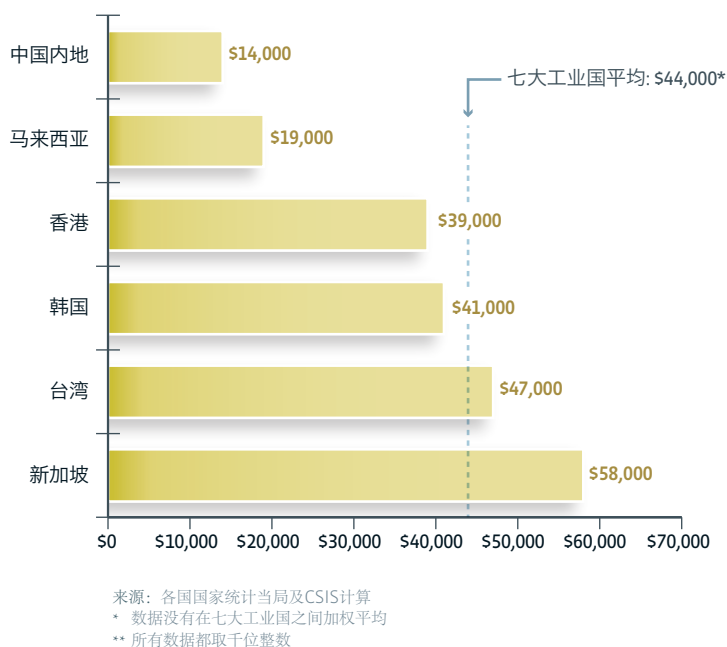


图2. 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计家庭年收入中位数，2010年或可获数据最近年份**

人往往陷入相对贫困，处于经济和社会的边缘地带。虽然东亚各国的政治权力总是集中在老年人手中，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经济权力则越来越向年轻人倾斜。在西方，年轻一代忧心忡忡，担心自己永远达不到父辈的生活水准——上一代人是在经济增速更快的时代进入成年期的。在东亚，年长的一代则惊叹于子女享有的史无前例的丰裕物质。在马来西亚和台湾，年龄介于20到39之间的年轻成人，家庭收入中位数是年长者的两倍多；在香港和韩国，前者是后者的三倍多。

更广泛而言，高速发展和现代化导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出现代际鸿沟。东亚的年轻一代不仅比年长一代更富有，其教育水平和市场导向性也更高；在很多国家，年轻一代的创业精神

也更活跃。以韩国为例。在目前这一代年逾七十的人刚刚成年时，韩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民们大字不识，生活水准比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还要低得多。如今，韩国的高中和大学毕业率居世界首位，而且已然成为东亚地区技术和文化新潮流的风向标。再来谈谈中国。现在，“红卫兵”一代已年近60及60出头，当年他们刚成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如今，在经历了三十年的两位数经济增长率之后，中国已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和金融强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支持着发展迟缓、债务缠身的发达经济体。

▣ **大多数东亚社会存在高度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通常会产生收入不平等现象——东亚新兴市场也不例外。有史以来，从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在过去几十年让如此多的人口脱贫。然而，也很少有国家基尼系数会像中国如此之高——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标准。在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收入不平等现象也很严重。只有韩国和台湾的基尼系数，与如今的西方经济体相仿。在一些被调查国家中，收入差距因更深层次的社会群体分化而进一步加强。在中国的城市中，持有官方城市居住证（即户口）的居民与主要由农民工构成的“流动人口”之间，存在着收入鸿沟。在马来西亚，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与更善于经商的少数族裔华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虽然收入不平等加剧的现象在一些西方国家也存在，尤其是美国，但其基尼系数与大多数东亚新兴市场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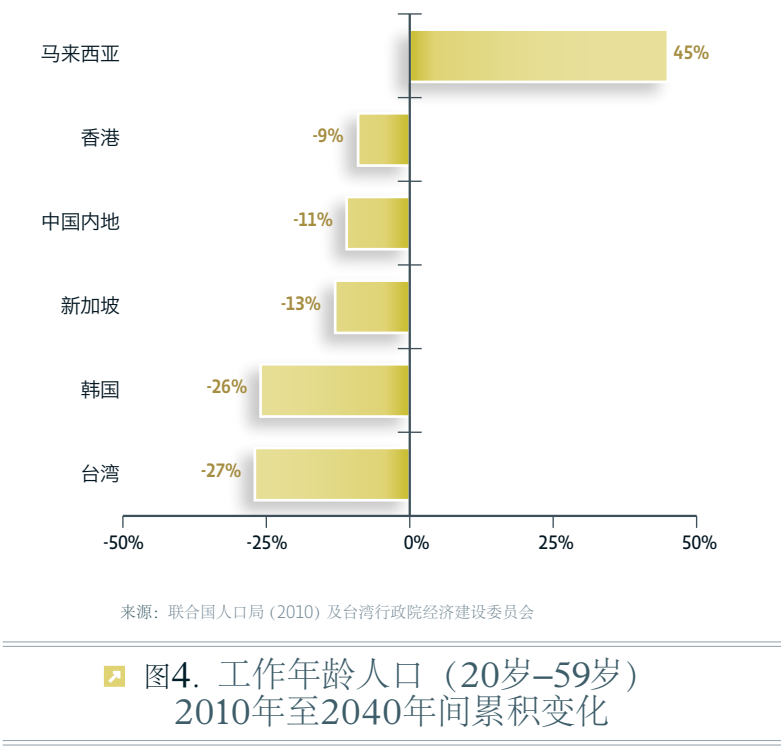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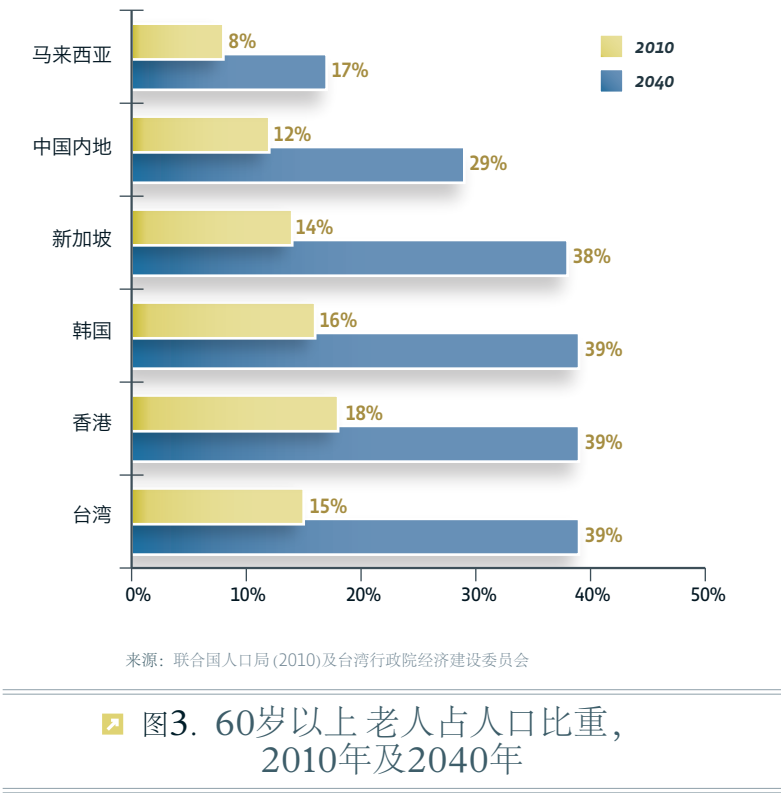
▣ **尽管现代化汹涌而来，东亚社会在诸多重要领域依然固守传统——尤其是退休保障态度。**大部分

被调查国家的福利制度不够完善，具有大规模的非正规部门。与西方国家相比，所有国家仍然更多地依赖大家庭提供养老保障。很大一部分老年人与成年子女一起生活，家庭内部的收入从年轻人流向老年人。而在西方，收入流向正好相反。在大多数被调查国家，家庭的作用因强调孝道的儒家伦理而得到了巩固。孝道要求成年子女资助和照顾年迈的父母。但是，我们将看到，更注重个人的“西方价值观”开始广泛传播，而且随着家庭规模缩小，很快将出现一股新的巨大人口压力。

▣ **东亚新兴市场的国家养老金制度覆盖面依然有限。**被调查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呈现明显的多样化特征。中国和韩国实行的是西方国家盛行的“现收现付制”模式，不过中国的养老金制度还包括了积累型的名义个人账户作为第二养老金。在现收现付制模式中，当前在职者的税收缴费直接用于支付当前退休者的福利。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通过公积金为退休福利提供资金，在职者的缴费被政府存入基金并进行投资和管理。在香港，公共养老金制度同样是基于个人储蓄，但在在职者的缴费由私人投资和管理。台湾正向混合型养老金体系过渡，该体系融合了现收现付制的第一养老金，以及做实的积累型个人账户作为第二养老金。所有被调查国家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的公共养老金制度都没有覆盖相当比例的劳动力，尤其是自雇者和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在大多数被调查国家，养老金的低覆盖率与人口的低替换率同时存在，意味着老年人口的财政负担可能低于西方国家。但是，这也意味着个人的负担——或者大家庭的负担——要比在西方国家更重。

■ **汹涌的老龄化浪潮令东亚新兴市场面临拉低经济增速、推高老年人赡养费用的威胁。**

随着人口转型的推进，老年人数量的相对增长最终将超过儿童数量的相对减少，而人口特征将开始阻碍经济的增长。除了马来西亚，所有的其他被调查国家现在都达到了这一转折点。未来三十年，老年人的比例将大幅上扬。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比美国更老迈的国家。届时，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老年人比例将逼近40%，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比肩，争夺地球上最老迈国家的桂冠。（见图3.）除马来西亚外，所有被调查国家的人口不仅正在老去，还存在数量停滞或缩减的问题。到2040年，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的数量将比目前减少近10%，韩国和台湾的这一数字则将为近25%。（见图4.）正如日本和西方，老年人赡养负担将增大，经济增长将放缓。因此，东亚新兴市场意识到如今正处于关键的转折点，在老龄化浪潮汹涌而来之前，只有短暂的时间来改革退休政策。



调查结果： 退休观念的变革

虽

然对人口、经济和社会大趋势的理解，是调查未来退休图景的必需条件，但只有详尽的调查数据才能提供直接的信息，让人们深入了解个体态度、行为和期望在这些趋势的影响下到底是如何演化的。我们讨论调查结果的第一步，是分析退休保障观念的变迁。在本章第一节，我们重点关注大家庭：目前，它在退休保障中发挥的作用，人们期望它在将来发挥的作用，以及在理想状态下人们期待它发挥的作用。我们将看到，这些作用并不总是一样的。在第二节，我们聚焦人们对个人承担退休保障职责的态度。在大多数被调查国家，我们发现相当广泛的人群坚定地支持这种个人责任。

家庭赡养力度下降

以几乎所有标准来衡量，比起在西方，大家庭在东亚的退休保障中发挥的作用要重要得多。在六个被调查国家中，35%到65%的老年人与一个或多个成年子女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其中韩国的比例最低，新加坡的比例最高。在主要西方国家，只有五个国家的这一比例超过了15%，只有两个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一比例超过了25%。同样，与西方大相径庭的是，东亚家庭内的财务资助是从年轻人流向老年人。在英国，相对于每一个表示从成年子女获得的资助多于给予子女的资助的年长退休者，就有16个表示要贴补成年子女的老人。在中国、韩国和台湾，从成年子女处获得财务资助的退休老人的数量，是贴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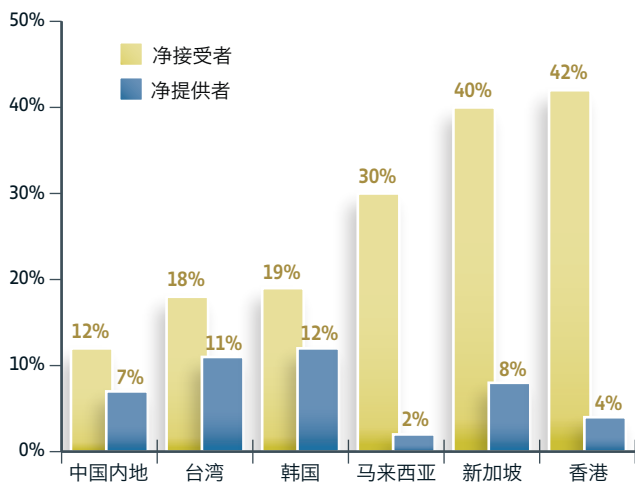


图5. 60岁以上退休受访者：来自其成人子女财务资助的净接受者占比，与净提供者占比

年子女的老人的近两倍。在新加坡，这一比率达到到了5:1；在香港是10:1；在马来西亚超过了15:1。（见图5.）

然而，本调查同时还反映出家庭在退休保障中发挥的作用，与人们期望它发挥的作用之间存在巨大的不一致。当被问及“最好由谁来为退休者的收入保障承担主要责任，是政府、前雇主，还是退休者本人以个人储蓄的方式，还是退休者的成年子女或其它家庭成员”时，只有很少一部分受访者回答说“退休者的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见图6.）即使在传统孝道得到最广泛支持的新加坡，如此回答的受访者比例也只有22%。在台湾，这一比例是7%，在韩国是5%。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这一比例最低的是中国，只有4%的受访者认为家庭应该为退休者的收入保障承担主要责任——与英国的1%相去不多。在大部分国家，这一观念在老年人、女性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受访者中的支持度较高。但是，在任何国家，这

一观念都不构成或接近人口中任何主要阶层的主流意见。

当然，大家庭除了提供收入资助外，还可以向老年人提供其他形式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是亲自护理病弱的老年人。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与提供收入资助相比，在提供这种形式的退休保障方面，相当多的受访者认为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应该继续发挥主要作用，这一点不足为奇。不过，除了新加坡，其他国家这一观念的拥护者比例少于 $\frac{1}{3}$ 。

对家庭在退休保障中发挥的作用所持有的观念不断改变，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规模缩

减的人口学现实。在所有被调查国家，几乎所有老年人都至少有一个子女可以施以援手，大多数老年人甚至有两个或更多的子女。但对于今天的年轻成人而言，情况已截然不同。除了一个国家，在所有被调查国家的20–39岁人群中，相当多的人没有孩子，也不打算生孩子：在马来西亚约占 $\frac{1}{5}$ ，在新加坡、韩国和台湾介于 $\frac{1}{4}$ 到 $\frac{1}{3}$ 之间，在香港甚至达到了惊人的 $\frac{1}{2}$ 。中国是一个例外，年轻一代中生儿育女的愿望几乎人人皆有。（见图7.）中国通过独生子女政策控制家庭规模，但几乎所有人都想成家生子。

但是，观念改变的最大推动力可能源自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相伴而来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更注重个人的“西方价值观”的传播。诚然，东亚地区的很多人仍然宣称无条件地信奉传统的孝道伦理。当被问及子女对父母应尽责任的哪一种观念最接近其本身的想法时，在所有国家中，至少有 $\frac{1}{3}$ 的受访者赞同，子女——即便是成年子

女——“应该始终尊敬和尊重父母，力所能及地奉养父母”。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赞同这一观念。然而，更引人深思的调查结果是，很多人持有不同的观点。在除新加坡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至少有30%的受访者指出“对尊敬和尊重父母过于强调了”，“如果更自立、更自足，父母和子女都会更快乐”。在韩国和台湾，这反映了主流观点。（见图8.）

文化理念的变迁已经影响到了目前的退休一代，并改变着未来退休者的预期。尽管以西方标准来衡量，东亚地区的数代同堂水平依然高企，但在大多数国家，这一水平至少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在下降。韩国的下降幅度最大，与成年子女一起生活的老年人比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骤减了一半，从78%跌至37%。尽管从成年子女处获得财务资助的父母，数量远远超过了要贴补子女的父母，但在所有被调查国家，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在中国和韩国占绝大多数——反映他们与成年子女处于“经济独立”状态。

展望未来，现今的在职者的预期显示，大家庭在退休保障中的作用很可能会持续减弱，但减弱的程度将因所在国家以及扶助类别而各不相同。在所有国家，目前已生育或打算生育子女在

职者中，期望将来在生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成年子女亲身照料的人，所占的比例都非常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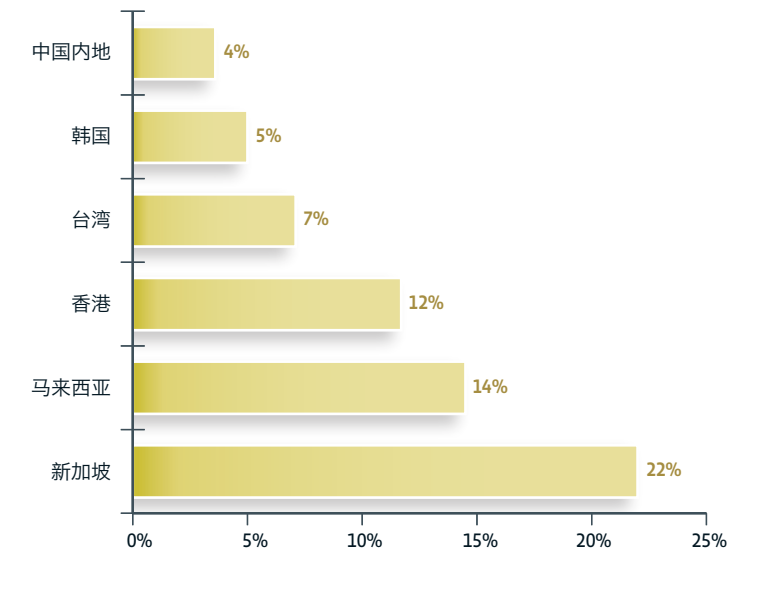


图6. “理想地看，谁最应该负责为退休者提供收入？”
回答“退休者成人子女或者其他家庭成员”的受访者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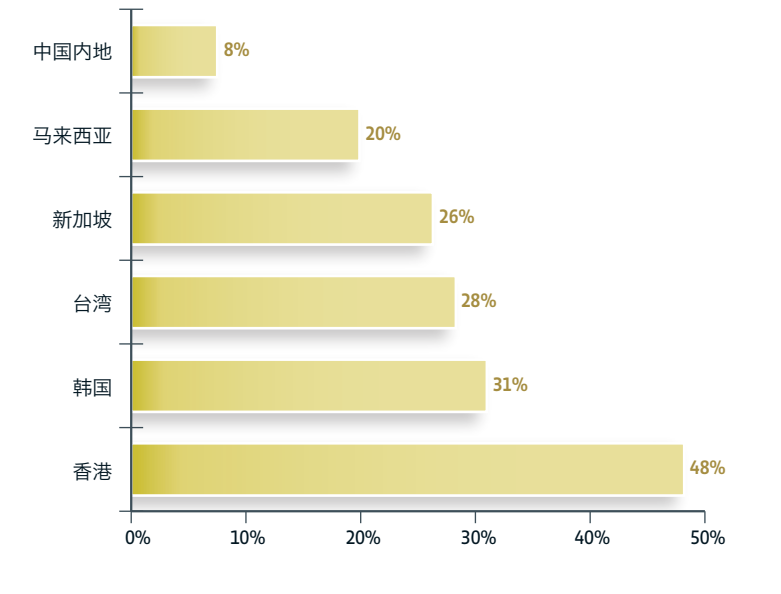


图7. 20岁-39岁受访者中既没有也不打算生育子女者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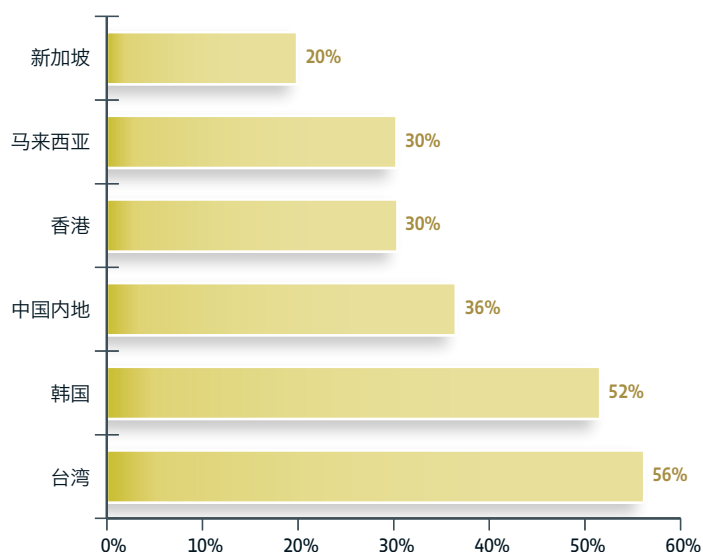


图8. “有关成人子女对其父母所负责任中，哪个回答与你最接近？”

回答“如果他们独立及自足，父母及子女都会感到更幸福”的受访者占比

(尽管大多数人不再将此视为理想的安排)。事实上，除了在韩国，至少有 $\frac{3}{4}$ 的当前在职者期望将来能获得成年子女的照顾。数代同堂的预期比率在中国、马来西亚和台湾也维持着高水平，但在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相对于现在一代老年人的预期，这一比率在直线下滑。韩国的家庭养老传统似乎承受着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压力，这一比率下滑尤其剧烈。当前已生育或打算生育孩子的在职者中，只有10%的人期望在退休或年老时，与子女共同生活，只占到目前数代同堂老年人的 $\frac{1}{4}$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比英国的当前在职者所预期的未来数代同堂比例还要低。

关于大家庭在退休保障中预期作用的观念变革中，最明显也最一致的变革是收入资助方面。在所有被调查国家，当前在职者期望在退休或年老时依赖成年子女的收入资助的比例，比目前的实

际比例要低得多。只有在马来西亚，当前在职者期望将来成为成年子女财务资助的净接收者的人数，是净提供者的两倍多。在中国、韩国和台湾，净接收者相对于净提供者的比率少于1:1。换言之，净收入转移的方向在这些国家正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更多的当前在职者预期他们将为成年子女提供财务资助，而非获取资助。(见图9.)

在这些普遍趋势之后，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存在着一些重要且惊人的态度歧异。人们可能认为，年轻成人作为东亚社会中受教育程度和西化程度最高的成员，会对孝道责任最为抵触。但事实上，年轻成人在相信成年子女或

其他家庭成员应为退休者提供收入承担主要责任方面，至少不逊于中年人。在台湾、香港和中国，年轻人的这一倾向尤为坚定。在台湾，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中，赞成家庭为退休收入承担责任的人数，是四十几岁成年人的两倍；在香港是三倍；在中国则接近六倍。而且，在中国和香港，二十几岁的人甚至比七十几岁的人更赞同这一观念。(见图10.)

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年轻成人，支持基于家庭的退休保障的比率更高，可能部分源于单纯的生命周期因素。中年人有时被称为“夹心一代”，他们往往上要赡养和照顾父母，下要养育和教育子女，承受着双重的压力。另一方面，大多数年轻成人尚未完全体会到孝道的负担。但是，年轻成人对基于家庭的退休保障的更高支持率，或许是价值观代际转换的主要指标，表示年轻人将

在今后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继续秉持这一价值观。这可能充分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年轻人对儒家文化的兴趣开始高涨，而政府——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消除儒家文化——正积极地鼓励这一趋势，甚至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中弘扬儒学思想。

但是，除非孝道观念获得更大的推动力，否则很难想象它能有效减缓以家庭为中心的退休保障传统的衰落。尽管在家庭为退休收入承担责任方面，不同年龄组的态度差异引人注目，但持支持态度的年轻成人的数量依然不大——在除香港外的所有国家的20–29岁人群中，这一比例不到1%，香港是1%。而且，即使孝道观念能获得更大的推动力，也要等到现在一代的年轻成人成熟之后，才能显示出全面的效应。

至少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未来退休者必然比当前退休者更依赖家庭之外的收入来源。

个人责任增强

如果家庭不承担主要养老责任，那么最好由谁来负起为退休者提供收入的主要责任呢？是政府、前雇主，还是退休者本人？虽然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在大多数东亚新兴市场，公众有着不同的看法。调查显示，在六个被调查国家中，有五个对个人承担养老保障的责任表现出巨大的支持，在某些国家甚至表现出明显的倾向。只有中国坚定地认为政府应承担主要责任，与其他国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同时，对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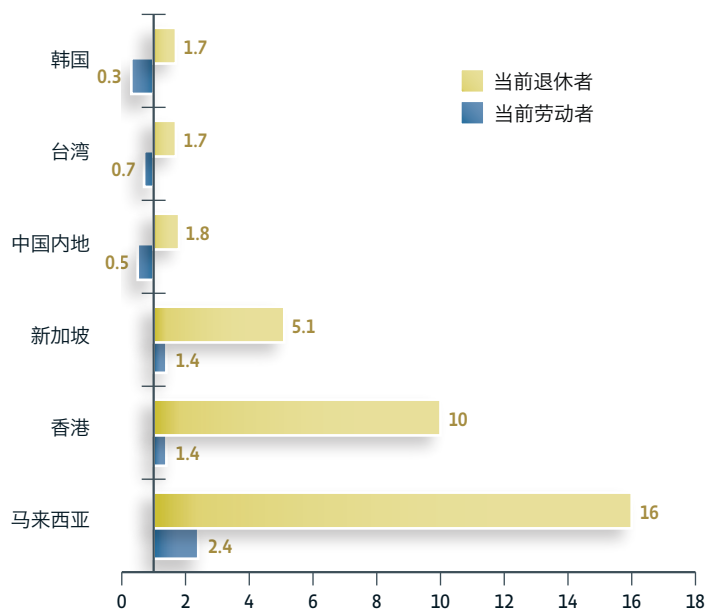


图9. 受访者中为其成人子女财务资助的净接收者，与受访者中净提供者的比例：
60岁以上当前退休者取实际比例，
20岁–59岁当前劳动者取预计比例

家庭扶养功能的第三个可能的替代者——前雇主，在大多数国家应者寥寥。除了在马来西亚和中国，不到1%的受访者选择了这一选项。（见表1.）

在韩国，大多数（53%）受访者认为，退休者本人应该负起为自己提供养老收入的主要责任，只有31%的人认为政府应负主要责任。在台湾，受访者对个人责任和政府责任的支持率分别是45%和36%；在新加坡，分别是40%和32%——并非绝对多数的支持率，但仍然是相对多数。支持个人责任的比例在香港更小：40%比37%。在马来西亚，调查结果看似公众明显更青睐政府责任：39%比31%。但是，如果将政府雇员（他们在受访者中占比过大，且支持政府责任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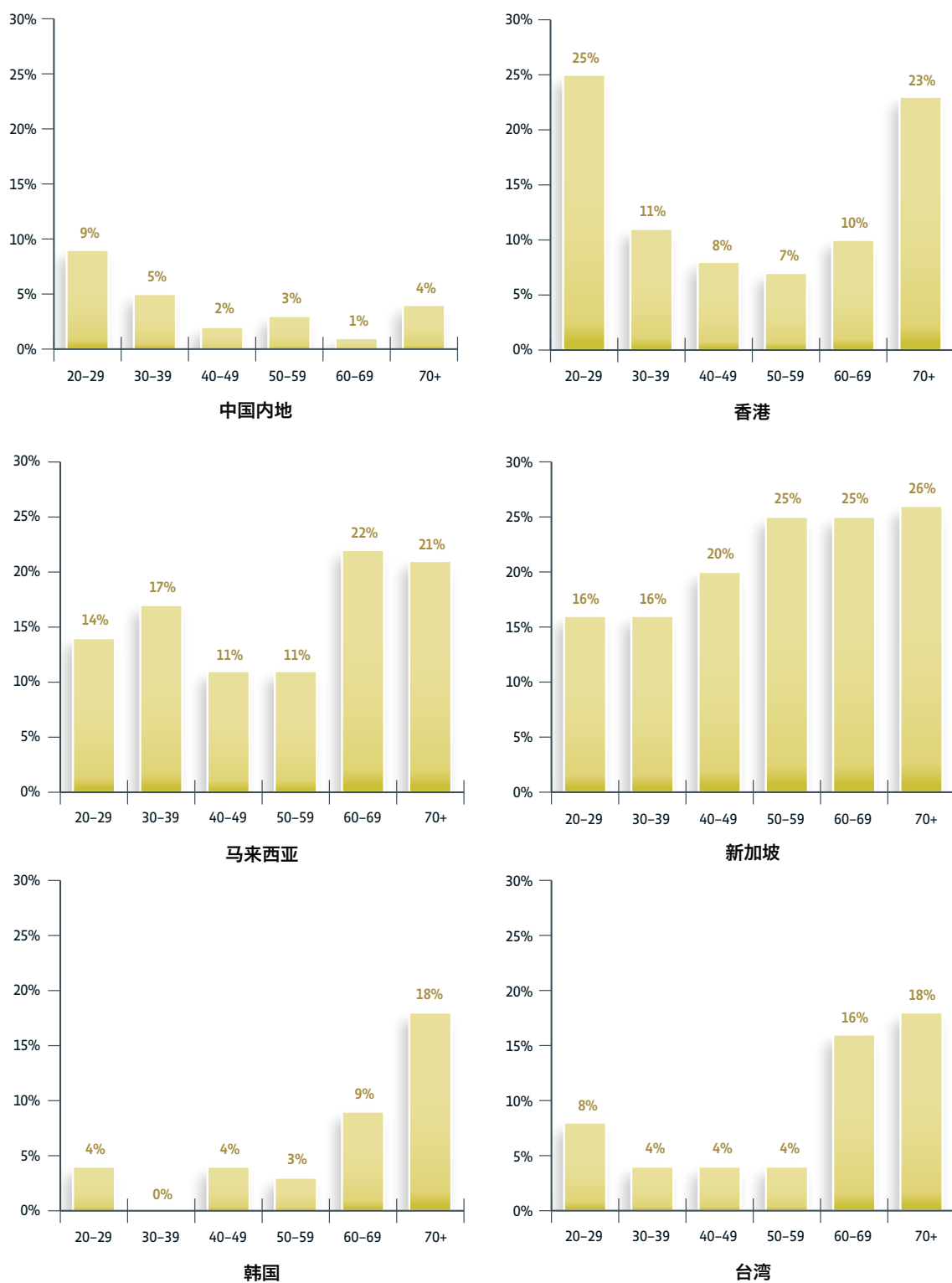


图10. “理想地看，谁最应该负责为退休者提供收入？”
各年龄组中，回答“退休者成人子女或者其他家庭成员”的受访者占比

表1. “谁最应该负责为退休者提供收入?”
按年龄组，受访者不同选择占比*

		依赖积蓄的退休者	政府	前雇主	成人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
中国内地	20-39	10%	54%	23%	6%
	40-59	10%	65%	17%	2%
	60岁以上	5%	71%	17%	2%
	所有	9%	63%	19%	4%
香港	20-39	42%	36%	2%	16%
	40-59	41%	37%	8%	7%
	60岁以上	36%	40%	3%	17%
	所有	40%	37%	5%	12%
马来西亚	20-39	27%	35%	21%	16%
	40-59	37%	40%	9%	11%
	60岁以上	22%	49%	6%	22%
	所有	31%	39%	14%	14%
新加坡	20-39	35%	42%	4%	16%
	40-59	40%	31%	3%	22%
	60岁以上	43%	26%	2%	28%
	所有	40%	32%	3%	22%
韩国	20-39	44%	40%	7%	0%
	40-59	60%	27%	5%	3%
	60岁以上	50%	31%	2%	14%
	所有	53%	31%	5%	5%
台湾	20-39	42%	40%	11%	5%
	40-59	48%	34%	11%	4%
	60岁以上	42%	35%	3%	16%
	所有	45%	36%	9%	7%

* 表格排除了“其他”及“不知道/不确定”选项

大得多) 排除在外, 那么天平将略倾向于支持个人责任。在中国, 情况迥然不同。只有9%的受访者支持个人责任, 约为马来西亚支持率的 1/3, 韩国支持率的 1/4。将近 2/3 (63%) 的中国受访者认为, 政府应该为退休收入承担主要责任, 另有 19% 的人认为前雇主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在某种程度上, 上述不同的倾向或许只是单纯反映了受访者习惯的退休制度类型。在新加坡, 施行的是基于个人储蓄的公积金, 不存在由政府提供资金的养老资助传统, 因此受访者倾向于个人责任。香港的退休制度主要也是基于个人储蓄, 而台湾正开始采纳这一体制。相比之下,

中国基本上施行的是现收现付制的国家养老金制度，这种由雇主提供退休保障的悠久传统，可以追溯到“铁饭碗”时代，基金制养老金储蓄却难觅踪迹，因此中国支持政府和雇主承担责任的比列最高。但是，这种关联性并非普遍存在。马来西亚也具有基于个人储蓄的公积金制度，但其对个人责任的支持率比新加坡要低得多。与中国类似，韩国主要施行的也是现收现付制的国家养老金制度，几乎没有基金制养老金储蓄的传统，但韩国对个人承担退休收入主要责任的支持率却最高，超过了被调查的所有其他国家。

那么，也许还有一个深层次因素在发挥作用——一个反映各国制度和市场发展阶段差异的因素。广泛和深入的资本市场，界定清晰的产权，保证市场透明度和问责性的高效政府监管，这些都是基于储蓄的退休制度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条件。如果公众相信这些条件存在，那么个人责任就是极具吸引力的选项。如果公众意识到这些条件不存在，个人责任就不会具有吸引力。换言之，整体市场越有效，体制环境越能培育和保障个人储蓄，那么对政府提供慷慨养老福利的需求就越小；市场和体制环境的效率越低，那么对政府提供养老福利的需求就越高。

抛开各国的总体倾向不论，让我们看看不同年龄组在态度上的差异，或许能够发现一些具有潜在重要性的趋势。例如在中国，工作年龄的成人显然比老年人更赞成个人承担责任，也显然不太赞成政府承担责任；而在新加坡，这两个年龄组的倾向恰恰相反。在中国，对市场的接受程度在增加；在新加坡，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增加。

除了年龄，收入当然也会影响人们对退休保障的态度。在大多数被调查国家，个人承担养老责任的支持率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上扬。在马来西亚和台湾，收入超过家庭收入中位数五倍的受访

者，对个人责任的支持率约比收入少于家庭收入中位数一半的受访者高出50%。在韩国和新加坡，前者对个人责任的支持率是后者的近两倍，香港为近三倍。相应地，上等收入受访者对政府责任的支持率很低，在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都低于1/4。在中国，甚至富裕阶层的多数人也支持政府责任。（见表2.）

尽管在大多数国家，对个人责任的支持率随着收入增加而急剧升高，但并不意味着对个人责任的支持仅限于富裕阶层。事实上，在所有倾向个人责任的国家，调查结果反映出惊人的广泛支持，甚至在低收入阶层也是如此。在新加坡和台湾，不论任何收入水平，甚至在最低收入水平，表示退休者本人应承担退休收入的主要责任的受访者比例，都要高于认为应由政府承担责任的人。在香港和韩国高于中位数的所有收入水平，受访者对个人责任的支持率均更高。

在总人口的不同子群体之间，对个体责任的支持率因其他因素也有所不同。在所有被调查国家，自雇受访者比普通上班族受访者更倾向于支持个人责任。这可能是因为很大比例的自雇受访者在非正规部门工作，因而不大可能参加政府的养老金计划，必须依靠自己的退休储蓄。“市场导向性”更强的受访者也是如此——我们将获得（如已退休）或期望获得（如仍在工作）的退休收入中至少有一部分来自股票或证券的人，定义为强“市场导向性”。在香港和新加坡，具备高等教育水平的受访者比一般人更乐于支持个人责任，但在马来西亚、韩国和台湾，情况稍有不同——在中国，教育水平更高的受访者却表现出相反的倾向。在马来西亚，市场导向性更强的少数族裔华人对个人责任的支持率，比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要高得多——事实上，几乎高了近一倍。在中国，农民工对个人责任的支持率比持有城市户口

表2. “谁最应该负责为退休者提供收入?”

按收入档次*, 回答“依赖积蓄的退休者”受访者占比, 相对于回答“政府”的受访者占比

		退休者自己	政府			退休者自己	政府
中国内地	< .5	5%	68%	新加坡	< .5	43%	27%
	.5-1	11%	60%		.5-1	37%	36%
	1-2	10%	62%		1-2	50%	27%
	2-5	11%	57%		2-5	44%	28%
	> 5	6%	68%		> 5	75%	25%
	所有	9%	63%		所有	40%	32%
香港	< .5	27%	35%	韩国	< .5	38%	49%
	.5-1	34%	47%		.5-1	54%	36%
	1-2	43%	37%		1-2	51%	31%
	2-5	48%	30%		2-5	57%	32%
	> 5	68%	19%		> 5	71%	14%
	所有	40%	37%		所有	53%	31%
马来西亚	< .5	33%	46%	台湾	< .5	37%	36%
	.5-1	33%	40%		.5-1	43%	40%
	1-2	27%	39%		1-2	45%	39%
	2-5	24%	41%		2-5	56%	30%
	> 5	47%	16%		> 5	58%	17%
	所有	31%	39%		所有	45%	36%

* 收入档次依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倍数而定

的受访者（即所居住城市的正式登记居民）要高一倍。正如自雇在职者，农民工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比例异常高，不太可能加入国家的养老金体系。

我们期待发现，却不见踪迹的一类差别，是明显的性别倾向。在西方国家，大量数据记录显示，男性更可能支持个人承担退休收入责任，而女性更可能支持政府承担责任。这种性别倾向在英国非常明显，39%的男性受访者认为退休者本人应该承担提供退休收入的主要责任，而只有28%的女性持此观点。但显然，这种状况在东亚未必如此。在中国和韩国，男性的确比女性更支持个人

承担退休收入责任。但在香港和新加坡，男性和女性的表现颇为一致；在马来西亚和台湾，女性事实上比男性更支持个人责任。

为了进一步衡量对个人责任的支持程度，我们还询问受访者，如果他们不能从政府或前雇主处得到任何退休收入，那么最好由谁来承担为退休者提供收入的主要责任？实际上，这等于要求受访者在个人责任和家庭责任中做出选择。关于这个问题，所有国家的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应由退休者本人负责。在台湾和韩国，持这种观点的受访者占极大的比例，分别是72%和78%。新加坡和中国属于例外，在这两个国家，表示成年子女

或其他家庭成员应该负责的受访者比例，甚至接近了表示退休者本人应负责的受访者比例。（见图11.）对新加坡而言，这种现象可能印证了儒家

文化的持久生命力。而对中国而言，则可能反映了群体责任凌驾于个人责任的广泛文化倾向。绝大多数中国人希望政府为退休保障承担主要责任，但如果无法选择政府，很大一部分人则退而选择了家庭。

大部分国家的大量受访者不仅倾向于为自己的退休筹备承担责任，同时还将退休筹备放在其他储蓄目标之前。当被问及人们在长期储蓄方面的首要目标应该是为自己的退休储蓄，还是为子女储蓄，还是说两个目标同等重要时，许多受访者不能确定，回答了“同等重要”。在所有国家，那些在两者选其一的人中，选择为退休储蓄的比例却超过了选择为子女储蓄的比例，而且在大多数国家，前者大幅超出了后者；少数国家的前者与后者的比率小于2:1，这些国家是中国和新加坡。在香港，两者之比是6:1；台湾是8:1；韩国是11:1。（见图12.）这并不表示东亚的父母不为子女的未来投资，尤其是子女的教育开支方面。实际上，他们投入大量资金，韩国更甚于其他国家。但显而易见的是，为准备退休而储蓄的生命周期动机，在家庭财务规划中要远远大于馈赠子女的动机。

饶有趣味的是，支持个人承担提供养老收入的责任，并未延及照护责任。当询问受访者如果退休人员失去劳动能力或日常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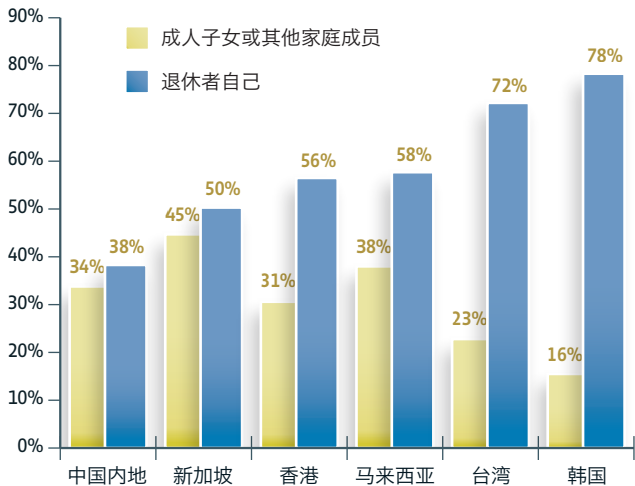


图11. “如果退休者没有从政府或者前雇主那里获得任何收入，谁最应该为他们提供收入？”

回答“退休者的成人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的受访者占比，相对于回答“依赖积蓄的退休者自己”的受访者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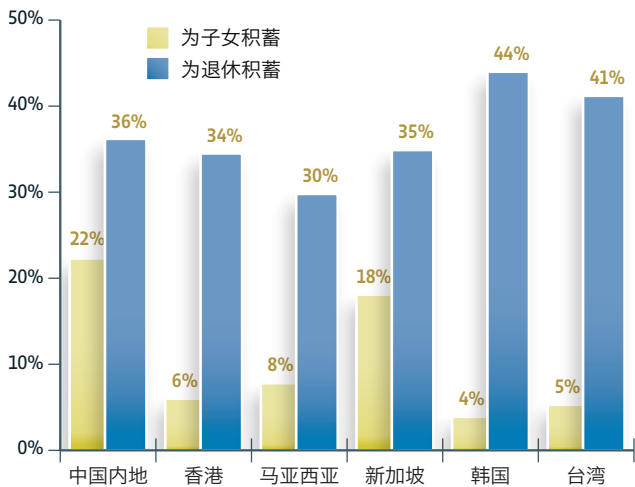


图12. “有关长期储蓄的哪个看法与你最接近？”

回答“首先要为子女储蓄”的受访者占比，相对于回答“首先要为自己的养老储蓄”的受访者占比

需要帮助，那么最好由谁承担为他们提供个人护理的主要责任时，回答说“退休者本人通过雇佣照护者承担”的人数，在韩国和台湾排在第二位，但远远少于第一选择的人数；在其他被调查国家则排在第三位。除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各国最普遍的答案是“政府通过雇佣照护者承担”；而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最普遍的答案是“退休者的成年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承担”。在韩国，对政府承担提供养老收入责任的支持率最低，对政府承担提供照护责任的支持率却最高。马来西亚对政府承担提供养老收入责任的支持率排在第二位，对政府承担提供照护责任的支持率却是最低的。

如何来解释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多数国家的政府已经至少为某种长期照护福利买单，而且有几个国家最近还颁布了或正在商酌扩大主要福利范围的法律。这自然会促生对政府支持的预期。在政府最致力于为退休照护福利提供资金的国家（韩国），支持政府承担退休照护责任的受访者比例最高；在对此最漠不关心的国家（马来西亚），支持政府承担退休照护责任的受访者比例最低，这绝非巧合。第二种解释是为个人照护和退休收入筹资的经济学因素，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个人照护需求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一旦出现时费用可能高昂且频发。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人都预期迟早会退休，他们更愿意为退休进行规划、准备并承担责任。

调查结果： 当前退休的现状

在

西方社会，退休后的岁月常常被称为“金色年华”，退休后的人们通常可以领取高额的补贴金，畅享努力工作换来的安逸生活。

然而，对东亚地区今天的大量退休者而言，退休岁月绝非金色年华。在过去十几年里人们退休时，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艰难的十字路口。传统的家庭赡养体系已然削弱，政府和市场的替代力量却尚未完善。同时，经济的急速增长导致退休的年长者与富有的年轻一代的生活水准差距明显拉大。

对于无法依靠大家庭的退休者而言，其他收入资助来源往往很有限。无可否认，所有被调查国家都建立了普惠的国家退休制度，旨在覆盖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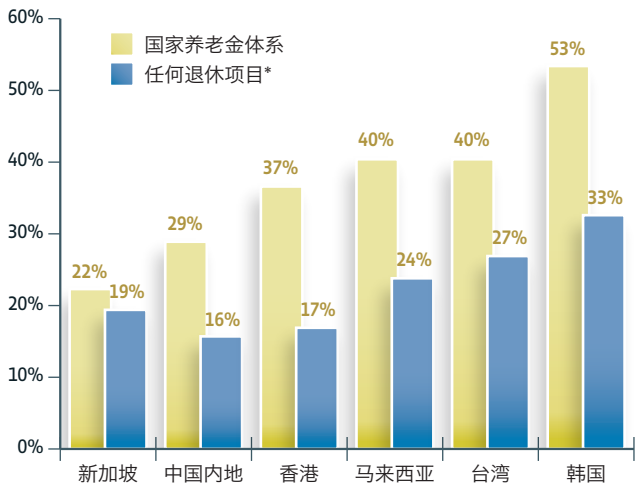
劳动者，或至少所有工薪阶层。但在今天的退休者中，养老金领取率远远未惠及全民，一部分是因为大多数国家的养老金制度尚待完善，另一部分是因为许多退休者之前在非正规部门工作，或曾是自雇者。新加坡略高于20%的退休受访者与中国近30%的退休受访者，反映未从国家养老金体系中获得任何收入——而这两个国家的养老金领取率是最高的。在香港，反映未从国家养老金体系中获得任何收入的退休受访者，比例接近40%；马来西亚和台湾则达到40%；韩国超过了50%。在一些国家，相当大比例的受访者从私人雇主或商业养老金获得收入，其中新加坡的比例（15%）最低，台湾（45%）最高。但是，由于大多数此类退休者从正规部门退休，已经也从国家养老金计划中获得收入，因此巨大的“养老

金差距”依然存在。多数国家还为经济困难的老人设立了特别福利项目，但这些项目的覆盖面通常有限。总计有 1/4 到 1/3 的退休受访者反映未获得

任何种类的退休福利，包括基于资产审查的贫困补助。（见图13.）相较之下，在英国，96%的当前退休者反映从一个或多个退休计划中获得了福利；在年满60岁及以上的退休者中，99%的人都如此反映。

鉴于多数东亚国家的家庭储蓄率很高，人们可能猜想大部分退休者至少拥有可依靠的个人金融资产。但是，今天大多数退休者的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国家经济发展程度远低于当前、市场导向性远逊于当前的时代度过的。而且，和西方国家一样，资产所有者严重依赖收入。在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近50%的退休受访者反映没有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没有保险或年金收入，没有股票或证券收入。在韩国，这一比例略微超过了50%。只有新加坡和台湾，有相当多数的退休者——约占 3/4——反映至少从金融资产中获得了某种收入。

即使退休年龄相对较晚，为退休筹资也非易事。而在东亚的新兴市场，退休年龄通常很早，增大了退休者耗尽所有积蓄的概率。在香港，半数退休受访者反映，他们在五十几岁的时候就退休了。在中国、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大约 2/3 的退休受访者如是说。在马来西亚，不可思议的是，十个退休受访者中有九个，表示自己在年满六十岁之前就退休了。（见图14.）他们的退休决



* 包括国家养老金体系，私人雇主及公务员退休金，以及政府按家计调查发放的现金福利

图13. 退休受访者中没有从不同退休金计划中获得收入者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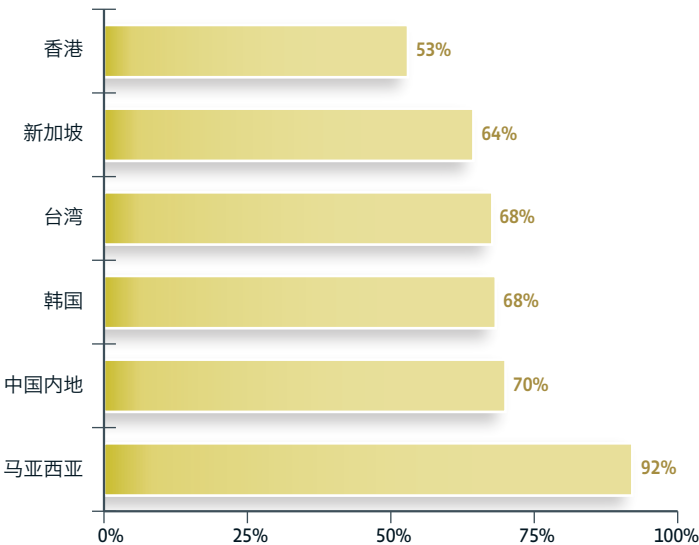


图14. 退休受访者中60岁以前退休者占比

定往往不是自愿选择，而是由于失业、患病、残疾或强制性退休规定所导致——在很多国家，最后一种因素最为普遍。当被问及“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被要求退休”是否为他们退休的原因时，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超过 $\frac{1}{3}$ 的受访者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在马来西亚，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做出肯定的答复；中国为超过 $\frac{2}{3}$ 。当被问及“希望停止工作或减少工作”是否为他们退休的原因时，在除新加坡之外的所有国家，至少有一半的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的答复。在韩国，81%的受访者做出了否定的答复；中国为86%。

虽然经济体中正规部门的退休年龄非常早，但很多老年人会继续工作，而且往往选择非正规部门的工作。所有退休受访者中， $\frac{1}{4}$ 到 $\frac{1}{3}$ 的人反映从工作或自有企业中获得某种收入。而且，相当比例的老年人——从中国的略高于15%到新加坡的近50%不等——表示他们根本没有退休。上述人群中的很多人还指出，他们将来也不打算退休。与已退休的同龄受访者相比，多数国家的未退休老年人曾在大公司工作的可能性小得多，从事自雇职业的可能性则要大得多——事实上，在台湾后者的这一概率是前者的近两倍，马来西亚是四倍，新加坡是五倍。但是，除了在中国，未退休老年人处于贫困的可能性并不高。相反，他们处于贫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原因正是他们尚未退休。

对很多人来说，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会大幅下降。在马来西亚，20%的退休受访者反映其收入比退休前要“少得多”。在新

加坡和台湾，这一比例在50%左右；在香港，接近60%；在韩国，达到了75%。这些国家中，只有很少数的受访者称其收入比退休前更高：在马来西亚这一比例不到15%，香港则不到10%，新加坡、韩国和台湾不到5%。中国退休者的经历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近50%的受访者称，他们的收入比退休前更多，只有不到15%的受访者称收入大幅缩水。（见图15。）中国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特例，部分原因在于国家养老金体系异常慷慨，中国的养老金领取率仅次于新加坡，而且其替换率是最高的。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今天的退休者曾是非常贫困的劳动者，当时中国的经济腾飞尚未起步，因此现在即便不高的退休收入，也足以让他们比过去富裕多了。

退休后还可能会经历一个强烈的焦虑期，这不足为奇。多数国家中，很多退休者担心失去退休福利，失去积蓄。更常见的是，他们担心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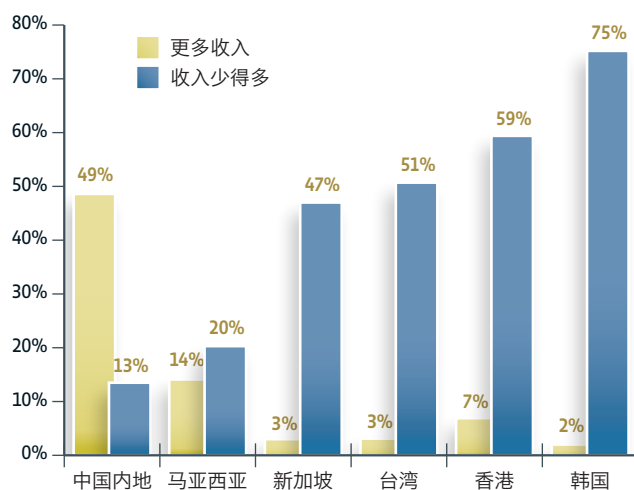


图15. “你已经退休的话，现在的收入与你退休前的收入相比如何？”

回答“现在收入更多”的退休受访者占比，相对于回答“现在收入少得多”的退休受访者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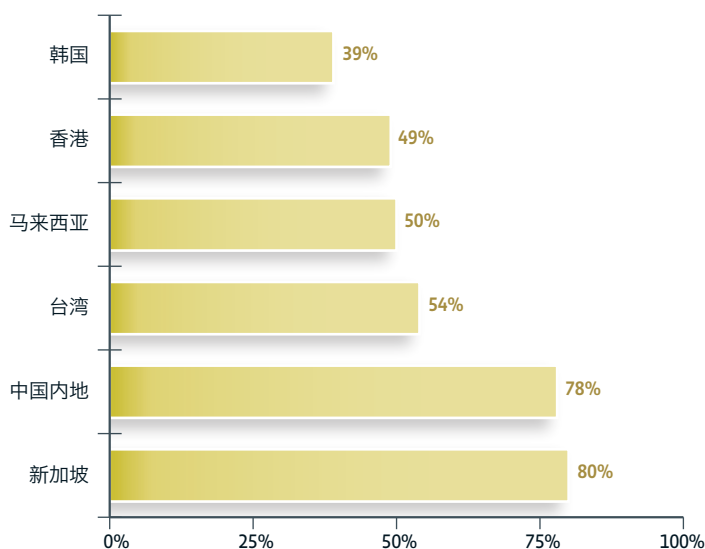


图16. 60岁以上老年受访者的收入中位数相对于所有受访者收入中位数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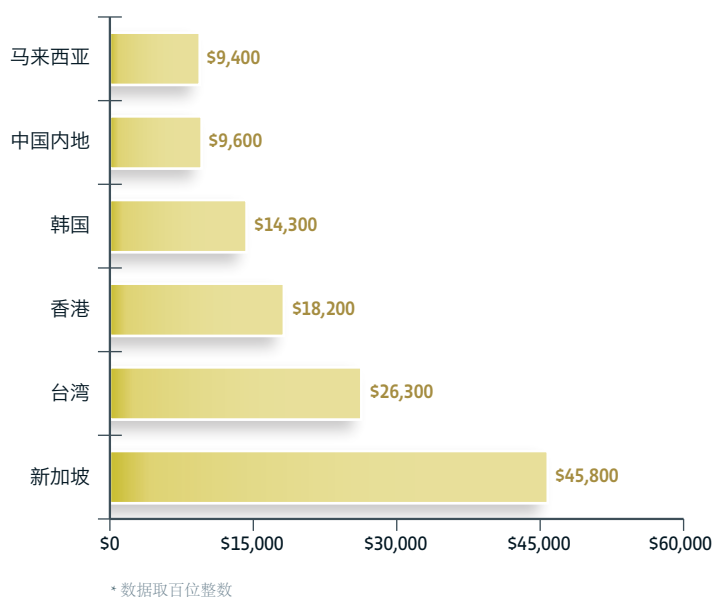


图17. 60岁以上老人受访者收入中位数，以购买力平价美元计*

照顾”（50%到80%）。在所有六个被调查国家中，与英国相比，退休者担心上述各个问题的可能性要高出至少50%到100%。香港退休者的担忧程度最低，因为该地区的家庭保障网相对强健，政府老年贫困最低保障（虽谈不上慷慨）的覆盖面广。马来西亚退休者的担忧程度最强，该国的退休年龄特别早，国家养老金体系的替换率异常低，且老年贫困最低保障几乎不存在。所有这些都解释了为何马来西亚的工会组织正在做一件令西方国家难以想象的事——游说政府和雇主提高退休年龄，以使年长劳动者避免陷入漫长而艰难的退休岁月。⁴

虽然焦虑是主观问题，但退休者——更普遍地来说老年人——的相对贫困却是客观存在的。在香港、马来西亚和台湾，老年受访者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约为所有受访者的50%。在韩国，老年受访者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甚至更低，仅占所有受访者的40%左右。只有在中国和新加坡，老年人的生活水准接近年轻成人，老年人受访者的家庭收入中位数约为所有受访者的80%。（见图16.）新加坡老年人的相对生活水准特别高，这是因为该国的情

“子女的负担”（40%到85%），担心“生活贫困，缺钱”（30%到85%），担心“身体糟糕，没人

⁴ “Hot Topic Survey: Minimum Wage and Mandatory Retirement Age for the Private Sector,” HR Matters, 2012年4月30日, <http://www.hr-matters.info/news2012/Hot-Topic%20SurveyMinimumWageAndMandatoryRetirementAgeForPrivateSector.htm>.

况很独特，老年人养老金领取率、资产拥有率、劳动力参与率和家庭支持程度都很高。在中国，则反映出国家养老金体系的异常慷慨。几乎半数的中国退休者称其大部分收入来自国家养老金体系，而所有其他国家的这一比例不超过20%。

当然，这些数字似乎不能说明各国老年人的绝对对生活水准。虽然中国老年人的相对收入与新加坡一样高，而且比其他被调查国家要高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老年人生活富裕或者比别国更优裕。尽管在最近几十年经历了蓬勃的经济增长，中国还远远不是高收入国家。以绝对美元（绝对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水准大约与马来西亚老年人相当，远低于其他被调查国家：是韩国的 $\frac{1}{3}$ ，香港的 $\frac{1}{2}$ ，台湾的 $\frac{1}{3}$ ，新加坡的 $\frac{1}{4}$ 。（见图17.）还要提醒一点，本调查只涵盖了

中国的城镇地区。虽然目前中国的城镇居民约占总人口的半数，但中国依然有广大的农村人口未纳入国家养老金体系中，这些人的人均收入中位数仅为城镇居民的 $\frac{1}{3}$ 。

除经济困境外，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令老年人心生无助感。我们询问受访者，以下哪种观点最接近他们的想法：“老年人对社会做出重要贡献，应该珍视其智慧和经验”，或者“老年人对社会贡献很少，基本上是负担”。不出所料，所有国家的绝大多数受访者赞同第一种观点——无疑是因为大部分人坚信这一点，但或许还因为这是一种在文化中获得广泛认可的观点。在一些国家，相当数量的少数受访者支持了第二种负面的观点。（见图18.）此外，与普遍的想法相反，多数国家的老年人比中年人或年轻人，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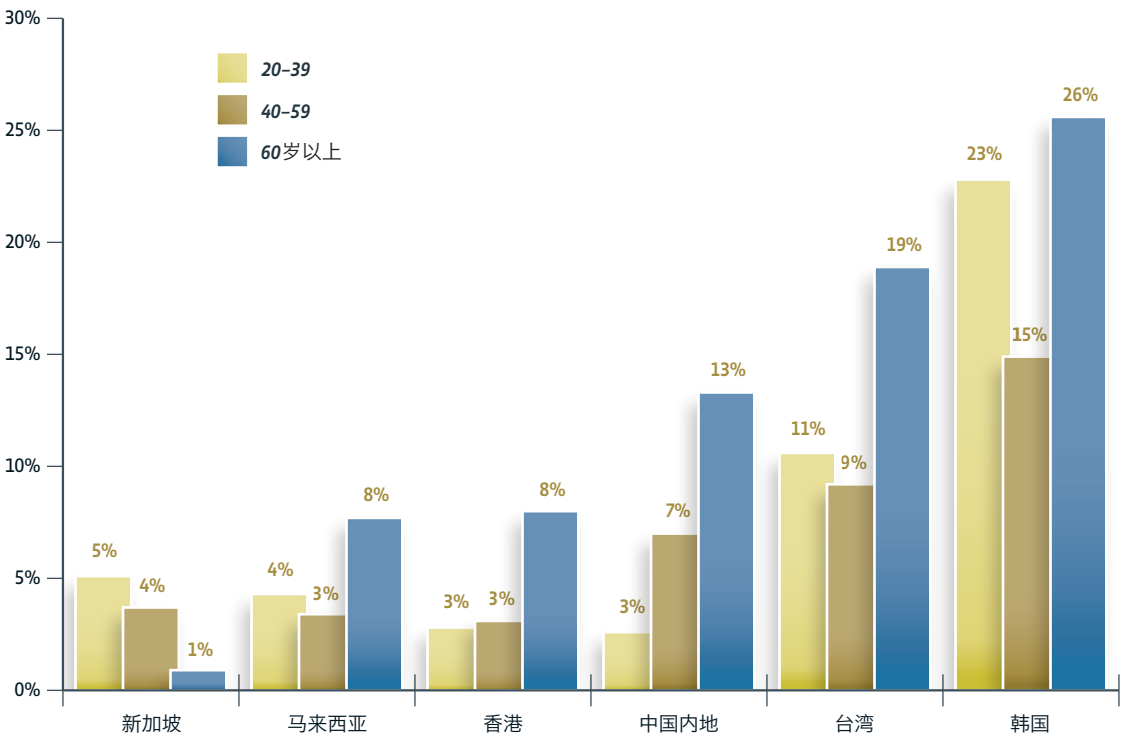


图18. “关于老年人的看法哪一种最接近你?”

回答“老年人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基本上是负担”的受访者占比，按年龄组

倾向于选择第二种观点。在中国，年龄在60岁或以上的受访者选择“老年人对社会贡献很少，基本上是负担”的概率，是年龄在20–39岁的受访者的五倍；香港是三倍；马来西亚和台湾是两倍。

韩国和新加坡却是例外，这同样启人深思。在韩国，老年受访者持负面观点的比例高达26%，这一比例在中年人中大幅回落，但在年轻人中却再次上扬——在所有20–39岁的年轻人中是23%，在二十几岁的受访者中竟达到了惊人的33%。在

新加坡，老年受访者持负面观点的比例很低，仅1%，完全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然而，这一比例随着世代下移而持续升高，在所有20–39岁的年轻人中是5%，在所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中是7%。东亚地区的人们普遍认为，孝道造就了几代人之间的和谐。但显然，正如快速的现代化进程让老年人产生无助感，守旧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在社会快速现代化之际——让年轻人心怀不满。

调查结果： 未来



我们在预测未来退休需求时，往往会假设明日的老年人将与今日的老年人有同样的期待，且行为大体不变。在所有的社会，假设生命周期行为一成不变，都令人质疑，因为新一代老去时，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会塑造新的人生态度。该假设在东亚地区尤其漏洞百出，目前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与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之间，代沟大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理解东亚的未来退休前景，起码要理解重塑年轻一代行为及预期的社会与经济力量。

■ **富裕程度上升。**在当今发达的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在几十年里一直放缓，老年人一般比年轻人富裕。在东亚的新兴经济体，年

龄因素起到相反的作用，劳动生产率迅速提升，推动工薪及生活水平一代胜过一代。除了中国与新加坡，被调查的国家中，中年成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水平远超老年人。而且，在除了韩国的每个被调查国家中，年轻成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超过中年成人家庭——在多数国家中，超过的幅度非常显著。（见图19.）相比收入，财富积累在更年长时，才达到顶点，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年轻成人并没有很多时间积累资产。但中国正经历着最快速的劳动生产率及生活水平的提升，财富往往在年轻人中也会达到顶点。

年轻一代日益富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天的退休现状，而且注定会更深刻地重塑明天的退休前景。举一个例子，日益富裕巩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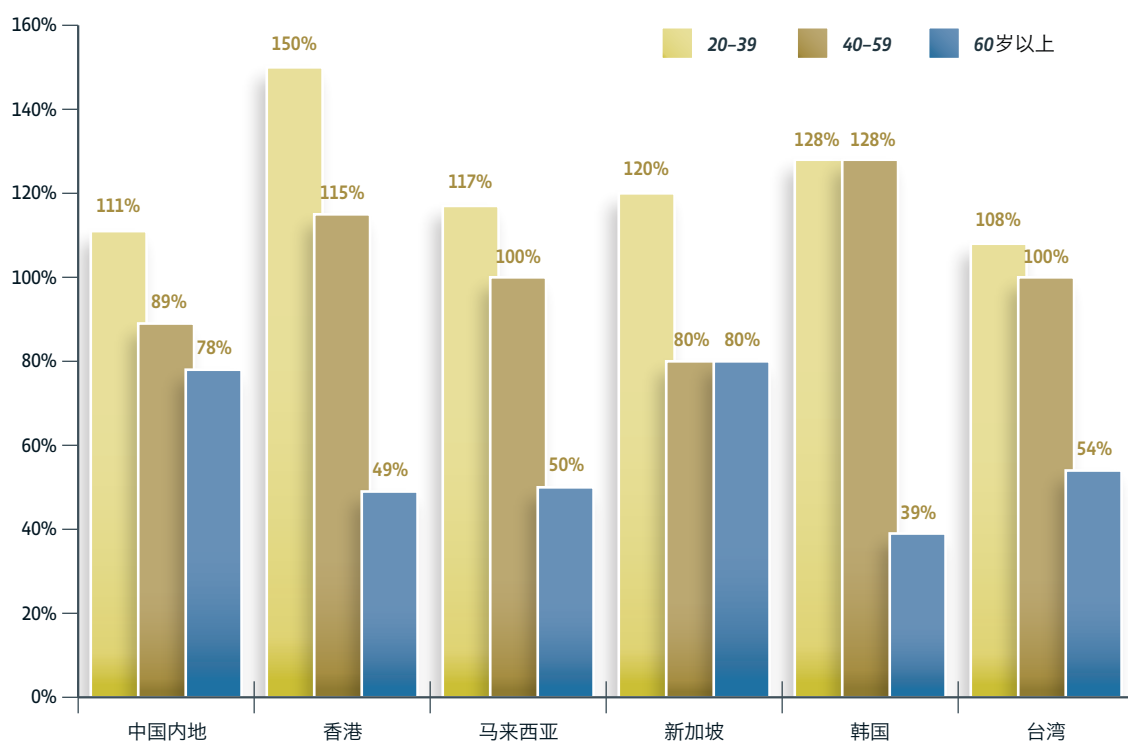


图19. 按年龄组受访者收入中位数占所有受访者收入中位数的百分比

了传统的孝道习惯，即使现代化的力量正在起削弱的作用。当老年人相对贫困时，家庭内部的收入自然会向年长者转移。然而，当更年轻和更富裕的几代人变老时，以及东亚社会财富及收入在年龄层之间的分布更趋西方化时，这些转移会减弱，甚至反向转移。事实上，如我们所见，这正是年轻的受访者预计会发生的事情。

与此同时，过去几十年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已经让人们更难以为退休而储蓄。尽管这显得自相矛盾，但这是退休经济学中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收入增长越快，人们需要储蓄越多，以替代退休时收入的相同份额。真实收入每年增长5%，在职者每年将收入的10%存起来，那么在工作35年后，已经积蓄的资产大

体相当于其退休前收入的三倍——足以支付可替代其退休前收入20%的退休金或年金。当收入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时，同一位在职者存起来同等百分比的收入，那么他积蓄的资产大约相当于其退休前收入的6倍，足以支付替代其退休前收入近40%的退休金或年金。未来，当东亚的劳动生产率及收入增长与发达国家趋同时，为退休积蓄将变得更加容易——而且基金制退休计划的优势相对于现收现付制度将会强化。

▣ **受教育程度上升。**从今天东亚所处的优势地位看，很容易忘记目前的一代老年人成长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早期。在六个被调查国家中，有一半到 $\frac{2}{3}$ 的老年受访者甚至连初中（或“中学教育”）都没有完成。而在20-39岁

的受访者中，超过90%至少初中毕业——在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这一比例超过95%。教育素养的提升并非只体现在低学历群体中。在中国大陆，年轻的成年人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是老年人的两倍。在香港、马来西亚以及台湾，这一几率为3到4倍，新坡是7倍。（见图20.）在新加坡、韩国和台湾，足有半数的年轻成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比多数西方国家还高。

东亚教育素养的显著提升，有助于解释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因为这是劳动者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这对于理解年轻成人如何为退休做准备，也有着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筹划未来、获得财

务知识、拥有金融资产。调查验证了这一命题。目前的在职者中，表示他们在投资储蓄方面接受专业财务意见的比例，随着教育水平的上升而大幅攀升。（见图21.）在职者中拥有金融资产者的比例也是如此。假以时日，接受更高教育的年轻成人进入高年龄阶段，劳动者中会有更多的人更加迫切地需要获得较高级的财务建议和产品——更加不容忍政府（或者金融业）阻碍其获得市场回报率的政策。

个人主动性增强。伴随服从传统和权威，东亚文化中总有一股反潮流，强调个人的主动性——而且这种潮流渐具声势。这一趋势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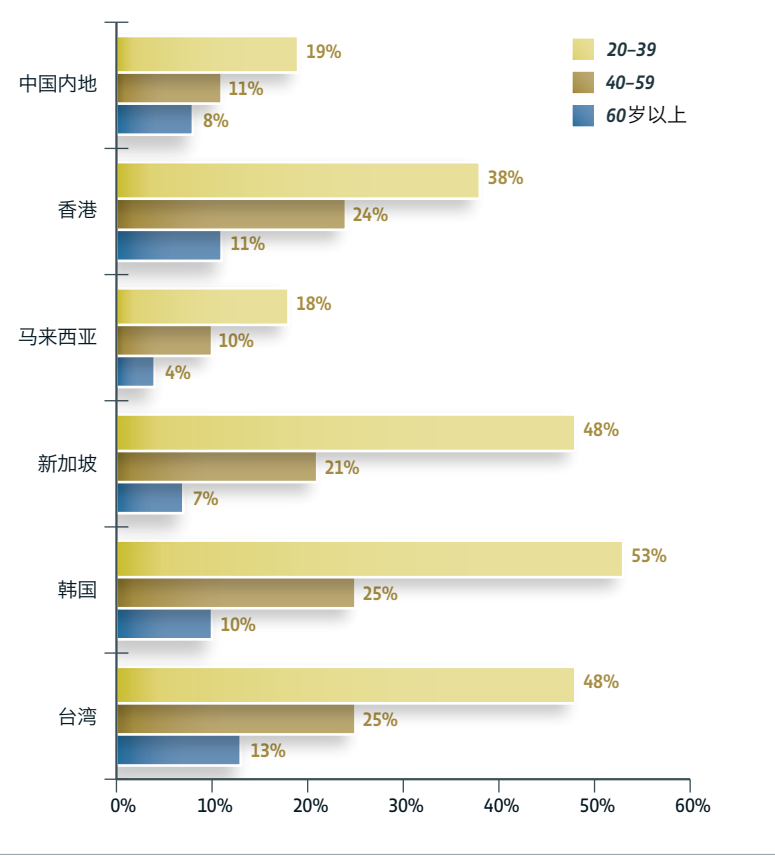


图20. 受访者中按年龄组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占比

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大多数国家，反映了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个人承担退休保障责任，而不再依靠家庭或政府来负责。更具体而言，还反映在对支配退休储蓄的态度上。受访者中表示个人应部分或全部决定其退休储蓄的投资方式的比例，一代胜过一代，与此同时，表示“政府及雇主最了解如何管理退休储蓄”所占的比例在下降，在20-39岁年龄段的受访者中，中国的比例低至15%，台湾为10%，其他国家则在5%以下。

这一趋势还反映在东亚国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创业，有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想自己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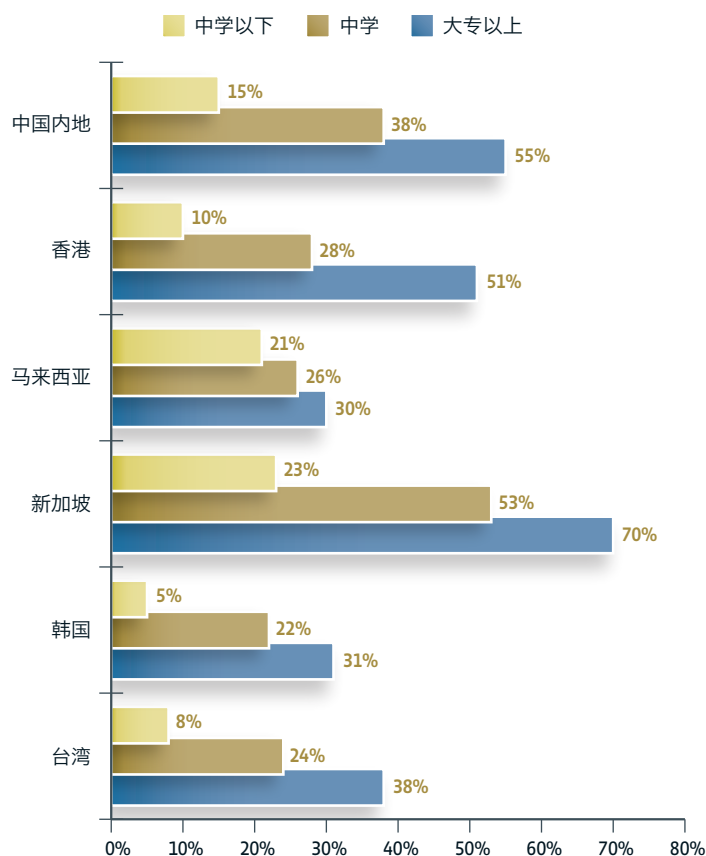


图21. “你曾经接受过有关投资你的积蓄的专业财务意见吗？”

按照受教育程度受访者回答“是”者占比

老板。本调查显示，今天成长的一代将在职业生涯中满怀创业精神，并且一直延续到退休。受访者中期望在退休或步入老年后，从自有企业获得收入的比例一代胜过一代，在20-39岁年龄段，除马来西亚外的每个国家，比例都超过了1/4，而中国和新加坡达到了一半。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年轻成人预计其退休或步入老年后从自有企业中获取收入者，几乎是预计从其成人子女获取收入者的两倍；韩国是三倍。

所有这些都表明，提升个人主动性及责任的政府或商业政策会受到欢迎，而起阻碍作用的政策受到的支持可能较少。重要的是，如果被视为支持个人主动性，即使是政府的强制措施，也可能会受到支持。在每个国家，绝大多数受访者——至少1/2——表示，政府应该“要求在职者为其未来的退休增加积蓄。”此外，在每个国家，持有此观点的受访者超过了表示政府应该“要求在职者缴纳更多费用，以支付政府退休福利”的受访者。在一些国家，支持强制储蓄的比例很可观：韩国为45%，新加坡为51%，马来西亚为58%。（见图22.）

市场导向性增强。富裕程度上升、受教育程度上升与个人主动性更强，这三个趋势正合力将东亚转变为世界上市场导向性最强的社会。在每个国家当前的退休者中，表示至少从金融资产中

获得一部分收入者约为50%，而在台湾，这一比例接近75%，新加坡则接近80%。在当前的在职者中，预期退休时或步入老年时从金融资产中至少获得一些收入者，每个国家都接近或超过80%，新加坡达到90%。

这一趋势不仅仅是由于更多的当前在职者拥有银行账户，而且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预期，来自各种金融资产的收入会增加，从年金和寿险到股票和债券，均包括在内。（见表3.）受访者中预计从股票和债券中获取收入的比例尤其

显著，从占受访者的比例来看一代胜过一代。在中国，当前退休者的获取率占4%，40–59岁的当前在职者预计为19%，而20–39岁的在职者预计为32%。在韩国，20–39岁的在职者预计获取率上升到20%，台湾42%，马来西亚49%，新加坡65%，香港66%。如此衡量，多数东亚国家的年轻成人不仅远比当前的退休者更注重市场导向，甚至远超过了英国的同龄人。在英国，20–39岁年轻成人预计从股票和债券得到收入的比例勉强达到1%。

今天的劳动者一代的市场导向程度值得关注，回忆上一代人的生活，在多数被调查国家，除了简单的银行账户，那时可供劳动者投资的选择实在有限——在中国几乎都不存在。然而，还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资产将在当前在职者退休计划中

更多缴费 更多积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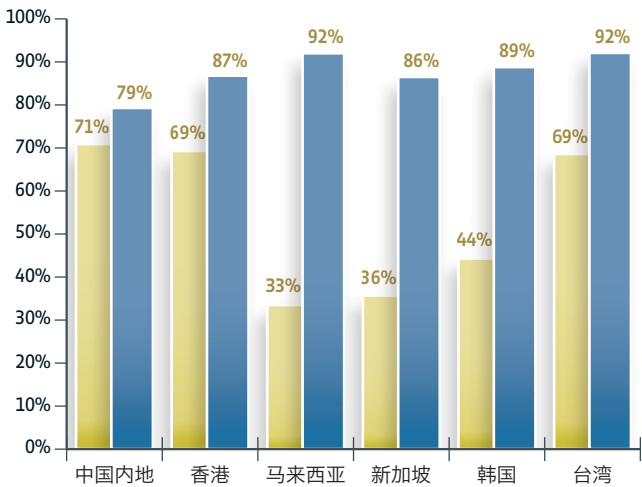


图22. “人口逐渐老化，有更多退休人口需要赡养，请告诉我你是否认为政府应该或不应该做到如下。”

受访者回答说“要求劳动者向政府缴费更多以支付政府退休福利”占比，相对于回答“要求劳动者为其自己未来的退休更多积蓄”占比

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令人期待——有时，可能只是一个梦想。如果公共和私有政策不能充分鼓励和奖励储蓄，所有事情都不可能按计划实施。

表3. 当退休或年老时，从金融资产中接受或预期接受至少一些收入的受访者占比，按资产类别：当前退休者的实际占比，相比当前劳动者（20岁–59岁）预计占比

	银行存款			保险或年金计划			股票或债券		
	当前劳动者		当前退休者	当前劳动者		当前退休者	当前劳动者		当前退休者
	20–39	40–59		20–39	40–59		20–39	40–59	
中国内地	66%	65%	38%	60%	48%	18%	32%	19%	4%
香港	75%	58%	42%	75%	61%	21%	66%	41%	30%
马来西亚	45%	30%	14%	39%	48%	29%	49%	58%	33%
新加坡	72%	77%	67%	86%	77%	53%	65%	52%	30%
韩国	61%	53%	38%	54%	50%	14%	20%	22%	13%
台湾	76%	56%	58%	76%	63%	39%	42%	31%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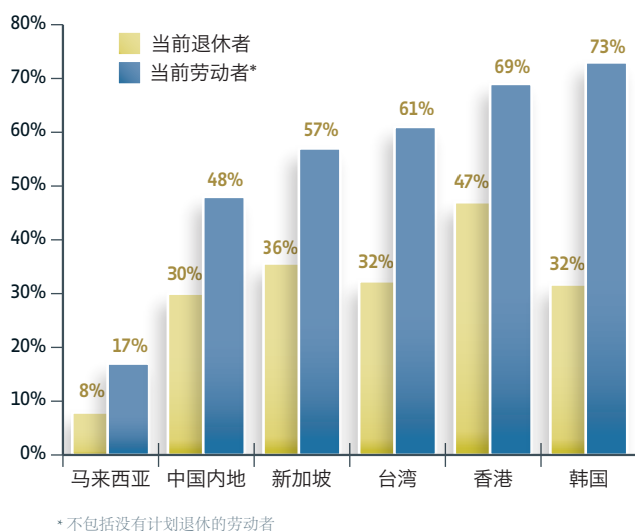


图23. 受访者中已经退休或者计划到60岁以后退休者占比：目前退休者实际占比与目前劳动者的预期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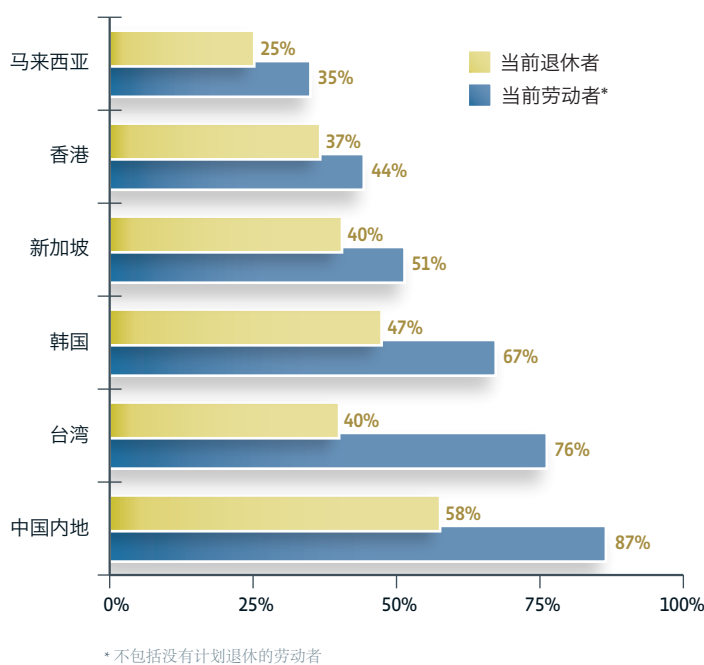


图24. 受访者中从工作或所拥有生意中接受或预期接受一些退休收入者占比：当前退休者实际占比与当前劳动者的预期占比*

对工作和退休的态度更灵活。

今天工作年龄的一代还在引领着另一转变——更长的工作年限和更灵活的退休安排。与今天的退休者相比，目前的在职者计划退休的年龄要晚得多。尽管在每个国家大多数当前退休者是在60岁以前退休，但除了一个国家外，当前在职者中有一半到 $\frac{2}{3}$ 预计60岁以后退休。而马来西亚例外，调查显示当前的提前退休模式可能会持续下去。（见图23.）与今天的退休者相比，当前在职者预计退休期间从工作中至少获得一部分收入的比例要高得多。实际上，除马来西亚和台湾之外，每个国家至少有一半持有此观点。

除了延迟退休的趋势，调查还显示多数国家的中年及年轻成人根本就不打算退休。在20–39岁人群中，这一比例在每个国家达到了至少 $\frac{1}{2}$ ，马来西亚再次成为例外，与延长劳动年限的大势背道而驰。毫无疑问，这一发展反映了相当大一部分人口持续缺乏退休准备，这一情况也许会不断恶化。当被问及不期望退休的理由时，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是因为：没有资格获得政府或雇主的退休福利（所有国家的比例为30%到60%，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较低），子女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帮助他们（所有国家的

比例为25%–50%)，以及自己没有足够的积蓄(所有国家的比例为40%到60%)。然而，到目前为止最普遍的原因是“工作带来快乐”，这在每个国家被至少⅓的受访者提及，这可能也颇具意味。除了韩国，至少⅓的受访者甚至认为这是唯一的原因。

在这个广泛波及的话题背后，情节发生有趣而又令人瞩目的转变。尽管目前在多数国家，随着世代下移，不打算退休的在职者比例稳步上升，但打算退休的在职者的预期退休年龄并没有上升。实际上，在年轻成人中，延迟退休的趋势中止，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逆转。为何年轻成人相比中年人，既更有可能预期从不退休，又更有可能预期提早退休？也许可以这样解释，退休这个概念本身在成长中的一代变得

更有延展性。这导致在预计提前退休的年轻成人中，期待其大部分（而非仅一些）退休收入来自工作及自有生意的，占了很大比例。事实上，在除台湾之外的每个国家，预计在60岁以前退休的20–39岁人群中，大多数期待从工作中获得大部分退休收入。也许，在这些年轻的成人心中，“退休”与传统的定义已大不相同。也许他们的意思是想告别第一份职业，寻求其他的就业机会。

对待退休的主流态度随年龄而变，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假设。在多数国家，与老年人相比，中年及年轻成人不太可能会说人们应该“在固定年龄退休，从此不再工作”或他们应该“只要能力许可，就继续工作”，而更有可能说他们应该“只要有能力和有意愿，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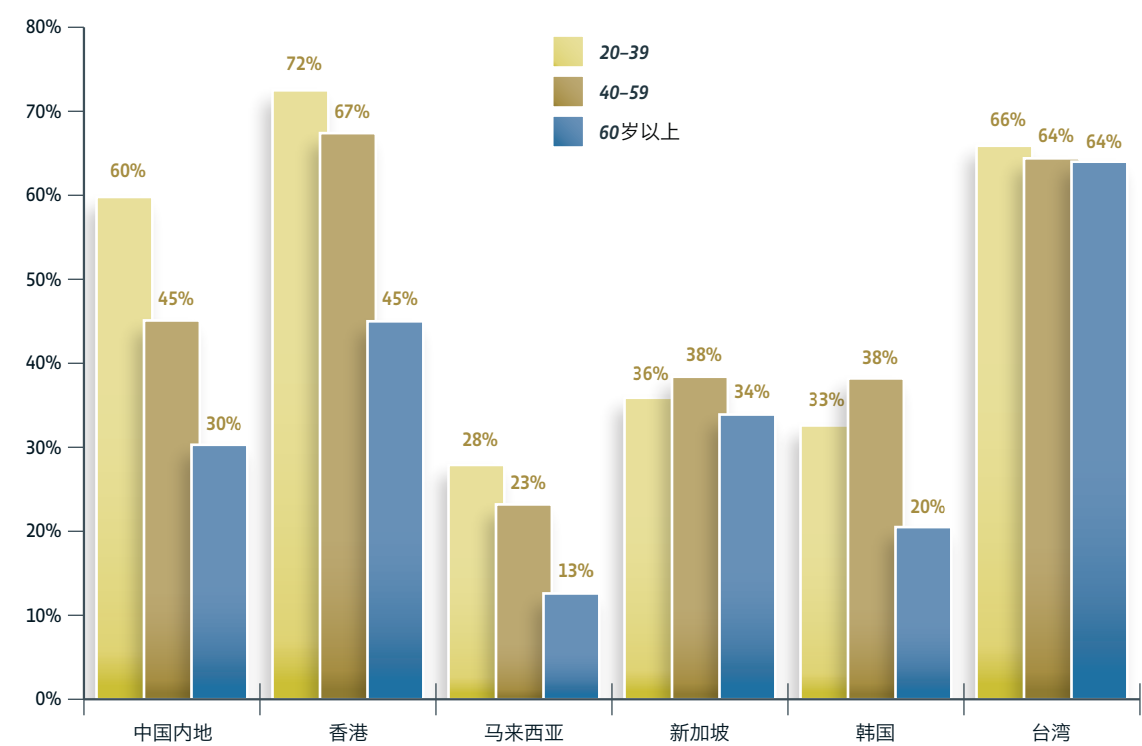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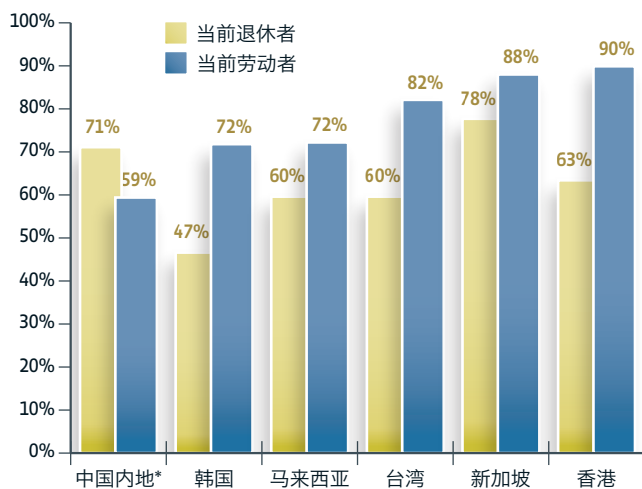


图25. “哪种关于工作及退休的看法最接近你的看法？”

回答“不管是有能力还是有意愿，人们应该自由地开始或停止工作”的受访者占比，按年龄组



* 数据仅指“城市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图26. 受访者中从国家退休金制度接受或预期接受至少一些退休收入者占比：当前退休者的实际占比与当前劳动者的预期占比

由地开始或者停止工作”。在中国和马来西亚，持有更灵活就业观点的年轻成人是老年人的两倍。（见图25.）与西方一样，东亚的在职者开始怀疑传统的“三大块”生活方式，即教育、工作、退休，是否自己的人生规划。尚待观察的，还有强制退休的政府和雇主严格政策，以及将年长的劳动者排斥在正规部门就业市场之外的政策，是否还适应这一代人态度的转变。

国家养老金体系走向成熟。几乎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今天的在职者相比今天的退休者，在工作年代得到的国家养老金体系福利更广泛，中国是令人惊异的例外。因此，除中国外，未来退休者的预期退休金获取率升高了，而且在一些国家出现大幅度地提升。在韩国，受访者表示接受或预计接受国家养老金的比例，从占目前退休者的47%，上升到占未来退休者的72%。

在台湾，从60%上升到82%，在香港从63%上升到90%。（见图26.）

尽管国家养老金体系的完善将改善未来退休者的收入前景，但全民退休保障仍是无法企及的目标。首先，未覆盖的空白区还显著存在。在香港、新加坡和台湾，20–39岁人群中，有10%到15%的受访者不指望从国家养老金体系中获得收入。在韩国这一比例达到24%，马来西亚达26%，中国达40%。而且，即使对于指望获得退休福利的大多数在职者而言，相关福利可能远远无法满足其退休收入需求。国家养老金体系的慷慨程度依国家而大不相同，但除台湾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养老金能达到劳动者退休前平均工资收入的一半。

相比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家退休制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管理的公积金中，目前退休者的替换率非常低，分别为25%和35%。⁵ 尽管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放缓，可能会提升未来退休者的养老金替换率，但要提供足够的福利，就需要提升在职者缴费的回报率，从历史上看，养老基金的回报率总是低于市场水平。⁶ 在香港，私人管理的强基金的确获得了市

场回报率。私人管理的强基金的确获得了市

⁵ 本段援引的当前替换率来自不同资料来源。参见 Donghyun Park, ed., *Pension Systems and Old-Age Income Suppor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Overview and Reform Directions* (马尼拉: 亚洲开发银行, 2011年); Pension Funds Online, Wilmington Publishing and Information, <http://www.pensionfundsonline.co.uk/category/country-profiles/>; 以及台湾行政院劳工委员会, 台湾劳工简讯季刊第1期, http://twlabor.tier.org.tw/Files_E/2010063093916e_1.pdf。

⁶ 马来西亚的雇员公积金和（尤其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收益率都低于市场水平，相当于对缴费在职者的隐性税收。这一点已有大量文献记载。例如可参见: Robert Holzmann, Ian W. MacArthur and Yvonne Sin, “Pension Systems i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0014 (华盛顿: 世界银行, 2000年); Augusto Iglesias and Robert J. Palacios, “Managing Public Pension Reserves Part I: Evide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Social Protec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0003 (华盛顿: 世界银行, 2000年); Mukul G. Asher, “Malaysia: Pension System

场水平的回报率，目标替换率是30%到40%。在韩国，现收现付制度下普通收入者的当前替换率是50%。但是，韩国政府在1988年建立这个制度后，出生率很快骤降，不得不两次下调承诺的福利水平。在年轻一代的在职者中，以退休时的工资水平来衡量，替换率预计会下降到仅35%。⁷中国的国家养老金体系也逐渐收紧荷包，未来普通收入者的替换率会下降到40%——远低于政府的目标。这主要是因为，名义基金制第二层养老金系统获得的回报远低于市场回报水平。⁸台湾的国家养老金体系也包括了现收现付及基金制层面，计划提供高达70%的替换率。但正如中国及韩国，随着人口老化以及缴费者相对受益者比率下降，台湾也可能面临日益增加的压力，从而削减现收现付制养老福利承诺。

中国的前景与其他被调查国家大相径庭，值得评论。今天的退休者来自铁饭碗时代，曾经同时享受非同寻常的高养老金领取率及高替换率，后者有时候超过了75%。但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制度”下，最近的几次改革已经令养老金替换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及农民工人数迅速增长，他们加入这个体系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于是降低了覆盖率。尽管有71%的当前退休者称在基本养老金体系下享受到了退休福利，但在目前的在职者中，仅59%预计未来会享受到这一福利。尽管政府正在尝试扭转覆盖面不足的局面，并引入

新的和更灵活的养老金选择，但调查显示，所有种类的政府退休福利的整体预计获取率仍有可能下降。与其他被调查国家不同，中国明天的退休者处境可能还不如当前的退休者。目前中国的在职者预计其退休或步入老年时的收入将超过目前收入的比例，仅为目前退休者中表示其收入高于以前在职收入的比例的一半——25%的巨大跌幅。而且，在被调查国家中，只有中国，称预计退休时收入会“大幅度减少”的当前在职者比例，实际上高于表示其收入比退休前大幅度减少的当前退休者的比例。

毫不奇怪，目前被调查国家中，仅少数目前的在职者预计会从国家养老金体系中获得其大部分的退休收入。事实上，在任一国家，仅 $\frac{1}{3}$ 预计如此。在中国、香港和韩国，这一比例不足 $\frac{1}{5}$ 。可以肯定地说，在从国家养老金体系获得福利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在职者还将获得雇主养老福利，因为在多数国家参与私营养老金计划的人数在增加。然而，今天的在职者中的很多人——即便不是大部分人——如果想在退休时保持同样的生活水准，最终将会严重依赖其个人积蓄。

■ **储蓄缺口挥之不去。**今天的在职者究竟需要多少积蓄，当然取决于许多因素。但是，即使假设在职者有资格享有国家养老金体系的福利，根据所在的国家，他们仍需要寻求足够的资源，来替换退休前收入的25%到50%，令总体替换率达到75%——这是金融规划师建议的最低目标。除非劳动者从前雇主获得慷慨的退休金福利、退休后继续工作、或有尽责尽孝的子女有意愿和能力资助他们，否则替换率与收入需求之间的差额需要用积蓄填补。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在职者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储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

Overview and Reform Directions,” in *Pension Systems and Old-Age Income Suppor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以及 Mukul G. Asher 和 Amarendu Nandy, “Singapore: Pension System Overview and Reform Directions,” in *Pension Systems and Old-Age Income Suppor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⁷ 参见 Richard Jackson, Neil Howe 和 Keisuke Nakashima, *The Aging of Korea: Demographics and Retirement Policy in the Land of the Morning Calm* (华盛顿: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2007 年)。

⁸ 参见 Richard Jackson, Keisuke Nakashima 和 Neil Howe, *China’s Long March to Retirement Reform: The Graying of the Middle Kingdom Revisited* (华盛顿: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2009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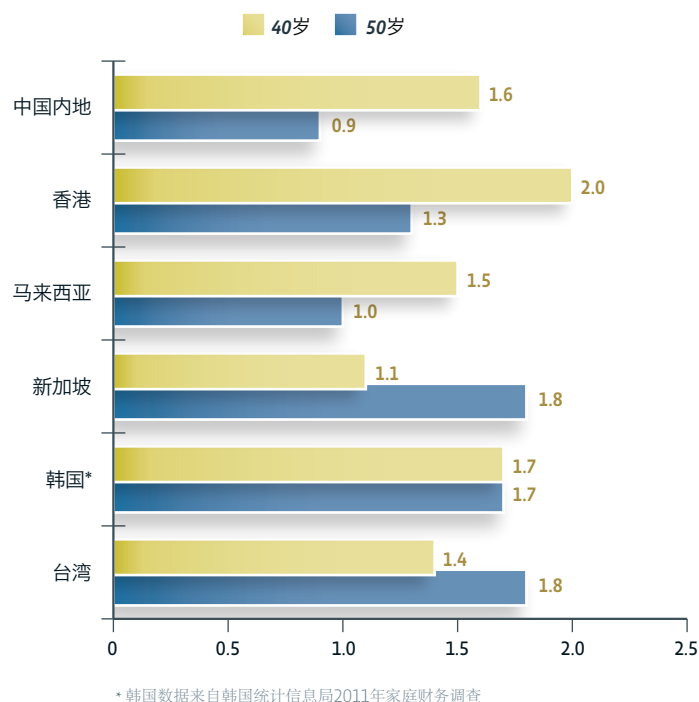


图27. 按年龄计，受访者平均净金融资产与收入之比

违背常理地假设其所有积蓄都将留作退休时使用。在40岁年龄段，受访者中平均金融净资产与收入比率在新加坡低至1.1:1，在香港高至2.0:1。即使到50岁年龄段，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一比率也未能超过2.0:1。（见图27.）不可思议的是，上述资产与收入的比率，相比英国等低储蓄发达国家也并不高，英国在40岁及50岁年龄段的比率均为1.8:1。换个角度

来看这些数据，资产与收入比达到2.0:1，对于65岁退休的人来说，足以保证大致等于退休前收入15%的替换率。如果在60岁退休，替换率会更低。

东亚国家因高储蓄率而为名，它们的资产与收入比如此之低，有几种原因。在东亚，家庭储蓄中很大一部分投资于房地产，而不是金融资产。此外，尽管年轻一代的市场导向意识越来越强，但金融资产投资中很大一部分，仍是低回报率的银行存款——在中国，这一比率竟然达到了 $\frac{2}{3}$ 。还有政府政策的问题，如利率管制及资本输出控制，都一度在东亚新兴市场中系统性地降低了个人储蓄的回报。尽管上述政策在该地区的多数经济体已经废除，但从老年劳动者的低资产-收入

比率上，仍然可以看到这些政策的影响。最后，我们已经知道，实际收入的高增长率，意味着家庭必须大量储蓄，才能防止资产对收入比率下降。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上述情况将有所改变。但即使如此，多数在职者，包括一些受过更高教育及市场导向性更强的在职者，如果想过上舒适的退休生活，将需要储蓄更多，获得更高储蓄回报，或两者兼得。

本调查提供的未来一瞥，既充满希望也令人担忧。从好的方面说，多数今天的在职者可能比今天的老年人拥有更完善的退休规划。凭借更高的教育素养、更大的个人主动性、更强的市场导向性，他们对家庭或政府的依赖性将减少。假以时日，当更年轻和更富裕的一代步入老年，今天在多数国家存在的老年人与其他人的生活水准之间的差距，将逐步缩小。

然而，更加富裕未必意味着更大的退休安全。今天的在职者，似乎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许多

人对这样的前景感到担忧。事实上，今天的在职者比今天的退休者更加担心。在所有被调查国家，当前在职者中相当多的人担忧政府或前雇主会削减其退休福利。更普遍地看，更大比例的当前在职者担心自己退休后会沦落到“贫困并缺钱”的处境。随着世代更替，收入水平不断增长，对于充裕的退休生活水准的期望也在提升。如上所述，退休金不足、储蓄有缺口以及家庭资助的弱化，这一切可能让许多劳动者的预期落空——而且让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面临艰难的暮年生活。

对于政府及企业的战略意义

本

调查显示，政府及企业可有多多种方法帮助个人为退休更好地绸缪——以及帮助整个东亚社会更好地准备迎接迫近的人口老龄化

问题。我们将重点阐述 8 条战略应对措施，4 条针对政府政策制定者，4 条针对金融服务提供商。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战略的支柱，有助于东亚的退休制度成功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对政府政策制定者的意义

■ **要求在职者为退休储蓄更多。**在世界各地的老龄社会中，扩大基于储蓄的退休保障是一个明智的策略，而这一策略也特别适合东亚新兴市场的制度现实与文化倾向。相比大多数西方国

家，大多数调查国家已经具备了基于全部或部分个人储蓄的全国退休体系。更重要的是，本调查揭示，大多数国家对个人负责退休收入有较高的支持水平，同时支持额外储蓄的意愿也相当强烈。

对东亚老龄化社会来说，更加依赖基金制退休储蓄有着令人信服的经济理据。在劳动力及劳动生产率超高速增长时期，现收现付制退休体系的回报率相当于在职者薪酬增长率，通常会超过基金制退休体系的回报率。现收现付制体系的福利可以通过年轻一代的收入增长来支付，实际上是让老年人受惠于其子女的经济增长，而基金制体系却很难跟上收入增长的步伐。但是，如果说在过去现收现付制模式更适合东亚社会的需要，将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随着劳动力增长越来越慢或缩减，且生产率增长向发达国家水平靠拢，基金制体系相对现收现付制体系的优势将会不容质疑。

那些实行基金制养老金体系的东亚国家应寻求巩固和扩大，而那些实行现收现付制体系的国家则应该开始向基金制转型。对于像韩国这样高度支持个人对退休收入负责的国家——以及国家养老体系中的大笔结余资金，都有助于他们顺利转型。这种转型在中国却要困难的多，因为人们对于政府资助抱有很高期待，且国家养老金体系累积了大量无资金准备的负债。改革虽然艰难，但却是必由之路。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可能会在本世纪20年代面临退休危机，届时，老年扶养急剧增加导致的人口及财政负担，将会与公众的预期迎头相撞。

■ 促进金融市场自由化，保护财产权，加强法治。

在退休保障基于储蓄的情况下，人们对储蓄的完整所有权必须得到确保。这就要求对妨碍储蓄者获得全球水平的资本回报率的政府政策加以变革。在6个接受调查国家中，对这项改革进程的需求截然不同。中国可能最为强烈，因为中国的产品和劳务市场的自由化很早就已实施，但金融市场仍然受制于政府系统性的管制，降低了个人储蓄的收益率。然而，即便是在新加坡这样拥有世界上最自由金融市场和最完善产权保护的國家中，政府管理公积金的供款人所获得的回报，也远低于市场回报水平。

■ 提高正式退休年龄。大多数接受调查国家和地区

的正式部门实行强制性提前退休，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代价高昂。退休年龄必须提高，理由诸多。随着东亚国家预期寿命提高，不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支付提前退休已经变得日益昂贵。当东亚的劳动力数量增长更加缓慢而且开始收缩时，其经济也将面临劳动力

短缺。与此同时，当前在职者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劳动生产率更高，也让推迟退休变得可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企业也许需要让技能差的老员工退休，为技能熟练的年轻劳员工腾出位置。但是在将来，让年长员工离职也毫无必要。

过去的几年里，接受调查的这几个国家（包括新加坡、韩国、台湾），已经开始清醒面对新的人口与经济现实，着手逐步提高退休年龄。这些改革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不仅仅因其符合经济规律，而且还体现了公众的意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大多数接受调查的国家中，相当大一部分中年和年轻人的工作年限，预计将长于当前的退休者。此外，当被问及政府是否应该提高退休年龄时，几乎所有国家的大多数受访者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在西方国家，提高退休年龄的动议通常会遭到工会组织、老年人福利游说团体以及一般大众的广泛反对。但在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至少有一半的受访者支持提高退休年龄——而在韩国，这一支持率高达85%。在中国这一支持力度相对较弱，仅3%的受访者表示支持。但只有在台湾，公众表达出近乎负面的回应，与西方国家类似。（见图28。）

■ 建立更慷慨的老龄贫困保障底线。世界其他地区新兴市的经验表明，在拥有大量非正式部门的经济中，供款型养老金体系要实现全民覆盖，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本调查显示，在多数国家中极少数当前工作者预计不会获得任何形式的正式退休福利，调查确认东亚亦存在这种情况。不久之前，政府还可假设大多数没有退休福利或充足个人储蓄的年长劳动者可由其成年子女赡养。但是本调查同样显示，这已经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因此，

政府设立充分的非供款型老年安全网——或有时称为“社会养老金”——已成为当务之急。现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都至少向贫困老人提供某种由税收支持的、基于资产审查的资助，但是这些福利一般来说微乎其微，而一些国家的福利覆盖极其有限，尤其是中国和马来西亚。设立老龄贫困保障底线的意义不仅在于确保社会的基本保障，在快速老龄化的社会中，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甚至政治危机。

对于金融服务提供商的意义

■ 为自己希望承担退休责任的在职者设计、营销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本调查所示，在大多数国家，大多数工作年龄成人渴望为自己的退休保障负责。调查还显示，大多数人担心他们的储蓄不够。这两个事实，加之中年人尤其是年轻成人对金融市场的日益熟悉，意味着对复杂金融产品的需求在未来几年将快速增加。但是，金融服务提供商也应该看到，年轻的一代受教育程度更高、市场导向性强，在投资选择上会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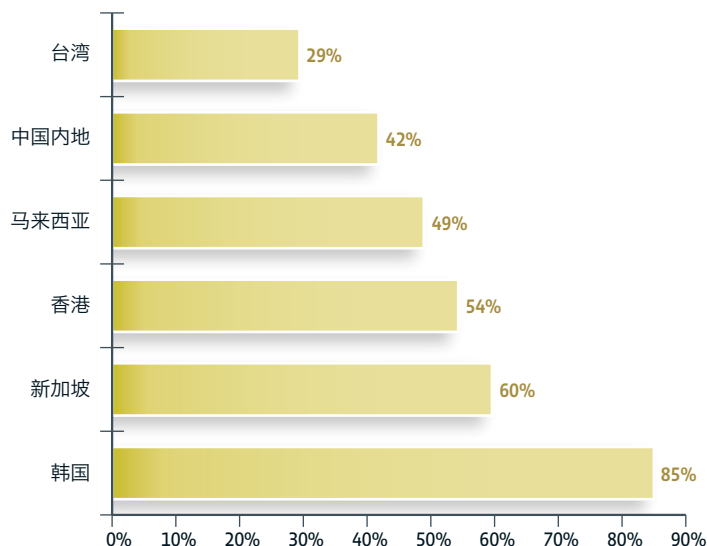


图28. “人口逐渐老化，有更多退休人口需要赡养，请告诉我你是否认为政府应该或不应该做到如下。”

回答“政府应该提高退休年龄”的受访者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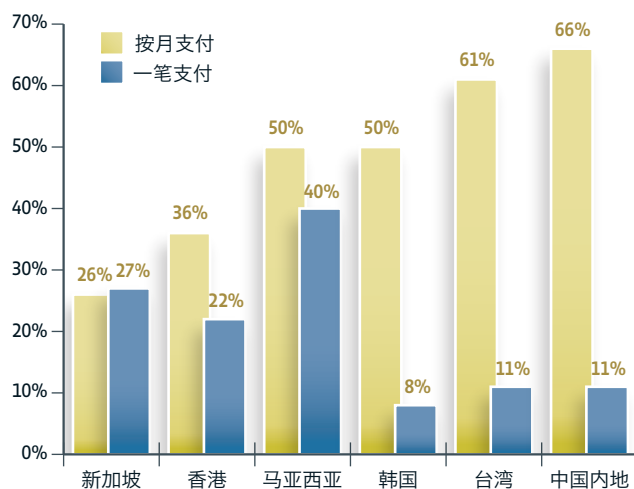


图29. “如果你可以选择退休时如何接受退休福利，请指出你更愿意以哪种方式接受。”

回答“退休期间都按月支付”的未退休受访者占比，相对于回答“退休时一笔支付”的未退休受访者占比

更多的自主权，更加关注自己的储蓄是否获得了市场水平的回报率。

■ **满足公众需要，将家庭储蓄和雇主一次性退休**

支付转换为年金。在大多数东亚国家，雇主一次性退休支付有长期的传统。但令人意外的是，本调查显示对退休收入年金化的支持比例非常高。在除新加坡外的所有国家中，受访者称如果可以选择更愿意逐月收取退休福利的比例，超过称更愿意接受一次性退休金支付的比例——而且在大多数国家，两者的差距相当大。（见图29。）人们懂得，一次性支付的方法过于原始，是家长式雇佣制度的遗留物，在人们可以提前退休、人的寿命延长的社会中显得不合时宜。年金化的吸引力还可能部分来自个人负责及财务独立的新趋势，因为年金让个人依赖子女的风险降到最低。

■ **为更灵活的工作和退休模式设计产品。**东亚社会正在开始摒弃终生受雇一家企业的传统模式。虽然许多年轻在职者计划延迟退休，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计划从常规职业中提前“退

休”，只不过随后他们会从事一些临时工作或开始创业。他们将希望有可能动用退休储蓄和保险产品，为过渡到第二职业筹措资金。

■ **在设计和营销金融服务产品时，不忽略孝道观念。**

例如，在韩国和台湾，强调退休及保险产品有可能替代家庭支持或可有助于产品营销。相比之下，在中国则应强调其可能替代政府福利。在新加坡，传统的儒家文化更加根深蒂固，因此应该强调多代共同分担。本调查还提出了一些其他有用的经验教训。就退休而言，切勿假设数代同堂与财务独立相互排斥。许多受访者表示，希望退休后既能财务独立，又能和儿孙生活在一起。亦不要假设年轻一代对孝道的抵触会继续增强。相反，本调查收集的大量证据显示，儒道复兴在一些国家已初现端倪。对于研究世界发展进程的社会学家来说，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现象。现代化的最初冲击通常会压倒传统——但随后传统经常会在年轻一代中复兴。

技术说明

本技术说明简要描述了CSIS东亚退休状况调查所采用的方法，并定义了报告中提及的一些主要术语及概念。

调查方法

CSIS东亚退休调查由全球知名的调查公司Ipsos执行。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的调查于2011年夏季完成；对中国的调查分两次进行，第一次于2011年夏季完成，第二次将在2012年冬季开展。Ipsos还在英国为CSIS进行了同样的调查。对英国的调查于2011年秋季完成，提供了一个与成熟的发达西方国家进行比较的视点。

除对中国的调查仅限于城市地区外，所有调查样本均随机选取，具有所在国家代表性。访问通过电话进行。调查主要针对20岁及以上的家庭主要收入人员，包括目前在职和已退体的主要收入者。受访者由采访者进行筛选，不符合这些标准者将从样本中剔除。CSIS采用人口统计数据和其他公认的国家及国际统计数据来源，按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对调查数据加权。CSIS使用SPSS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香港特别行政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以及英国的样本量介于748到953之间；中国的样本量为2826。除中国以外，所有国家的调查均在95%置信区间，误差幅度介于±3.2%及±3.6%之间，中国则为±1.8%。（参见附表）

样本量及误差幅度

	样本量	误差幅度 (+或-)*
中国内地	2826	1.8
香港	803	3.5
马来西亚	842	3.4
新加坡	931	3.2
韩国	748	3.6
台湾	953	3.2
香港	944	3.2

* 误差幅度在95%置信区间

定义

▣ **年龄组：**调查受访者被划分成如下三大年龄组：

- ▶ “年轻人”= 20–39岁
- ▶ “中年人”= 40–59岁
- ▶ “老年人”= 60岁及以上

▣ **受教育程度组：**调查受访者被划分成如下三大受教育程度组：

- ▶ “中等以下教育”= 未受教育、受过部分或全部小学教育、受过部分初中教育
- ▶ “中等教育”= 完成初中教育、受过部分或全部高中教育
- ▶ “高等教育”= 中等教育之后的任何教育

▣ **家庭收入：**家庭收入包括调查受访者的收入及家庭其他成员的全部收入。收入分组定义相对于全国家庭平均收入，而不是调查平均数。

▣ **资产收入比率：**在计算平均净金融资产收入比时，我们首先取出每个受访者的净家庭金融资产与收入的比率，然后再取这些比率的平均值。结果与公布的除韩国外所有国家的净金融资产数据相一致。在此，我们采用来自韩国统计信息局2011年家庭财务调查的数据。

▣ **退休者与当前在职者：**把受访者划分为退休者与当前在职者是根据受访者的自我认同。受访者被告知退休意味着“不再工作，或者工作时间少于年轻时且不打算再次全职工作”。随后他们被问到是不是“目前已经退休”。

关于作者

理查德·杰克逊 (Richard Jackson) 是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的高级研究员，主管全球老龄化项目，该研究项目探索美国与全球各地的人口趋势对经济、社会及地缘政治的影响。他还是协和联盟 (Concord Coalition) 的高级顾问。杰克逊在政策研究方面著述甚丰，单独或与人合著有《银发中国》(2004)、《长期移民预测方法：当前的实践及如何改善》(2006) 以及《强国老龄化》(2008)。杰克逊就长期人口问题及经济问题发表评论，并被国际媒体广泛引用。他从耶鲁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获得古典文学学士学位。他与妻子 (Perrine) 以及三个孩子 (Benjamin, Brian 和 Penelope) 住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

尼尔·豪 (Neil Howe) 是一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常就人口老龄化、长期财政政策、历史上的代际问题著述并发表言论。他是 CSIS 全球老龄化项目的高级副研究员，兼任协和联盟的高级顾问。他还担任 LifeCourse 顾问公司的创始合伙人及总裁，为公司、政府及非营利机构客户提供营销、人力资源及战略规划服务。豪著述甚丰，单独或与人合著有《借来的时光》(1988)、《代际》(1991)、《第十三代》(1993)、《第四转折》(1997)、《千禧年崛起》(2000) 以及《强国老龄化》(2008)。他从耶鲁大学获得历史学及经济学学位。

托比亚斯·彼特 (Tobias Peter) 是 CSIS 全球老年化项目的研究助理，他的研究领域涉猎甚广，包括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长期经济、社会、地缘政治挑战。彼特毕业自 St. Scholastica 学院，拥有历史及应用经济学学士学位。

关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在全球机遇和挑战风起云涌的时代，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CSIS) 为决策者提供战略洞察力与实际的政策解决方案。自1962年成立以来，CSIS已成为世界上最为卓越的公共政策机构之一，拥有超过220名全职雇员以及一个庞大的学者网络。CSIS是一个跨党派的非营利机构，总部设在华盛顿，针对全球的各个地区都开展了研究项目，也研究跨区域的国际性挑战，如能源、气候政策、人口变化、全球发展以及经济一体化。前美国参议员 Sam Nunn 于1999年成为 CSIS 理事会的主席，John J. Hamre 自2000年以来担任 CSIS 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SIS 的全球老龄化项目 (GAI) 旨在探究人口老龄化的财政、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影响。GAI 的目标颇具雄心：承担前沿的研究项目；出版关注高的报告；组织世界领袖出席国际会议，讨论共同关切的问题并寻求普适的解决方案。

关于瀚亚投资 (Eastspring Investments)

瀚亚投资是一家总部位于亚洲的最大的共同基金管理人之一，管理基金规模达 850 亿美元。我们是亚洲最大的在岸共同基金管理人，并且是该地区最大的固定收益投资者之一。我们的业务遍布亚洲 11 个国家和地区，并在其中的 9 个驻有员工。我们提供诸多资产等级的产品，包括亚洲权益类 (含日本)、固定收益和不动产。我们的机构客户包括央行、主权财富基金、政府背景公司。我们还为所属的保险公司管理相当规模的资产，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的成员公司之一，从 1863 年起在亚洲投资。我们长期深耕亚洲的背景，使我们对当地投资的知识傲视同侪。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800 K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6
USA

Tel: + 1 202-887-0200
www.csis.org

**EASTSPRING INVESTMENTS
(SINGAPORE) LIMITED**

10 Marina Boulevard #32-01
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Tower 2
Singapore 018983
www.eastspringinvestments.com

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eastspring**
investments